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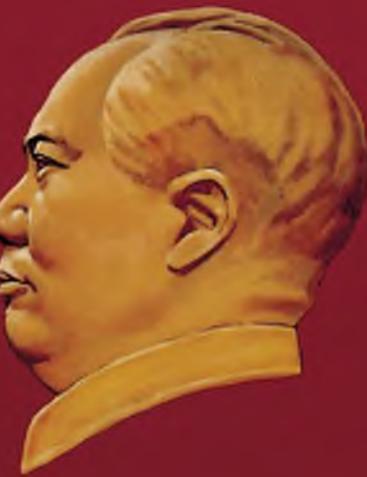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润东出版社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列寧格勒印刷三厂工人理论小组

光学字符识别处理

lenin3print.github.io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润东出版社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 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1 (1957年4月19日)	
给袁水拍的信………3 (1957年4月20日)	
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5 (1957年4月21日)	
给达赖喇嘛的复电和对复电稿的批语………9 (1957年4月22日)	
接受瑞士大使贝努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1 (1957年4月22日)	
对中央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的修改和说明 …12 (1957年4月23日)	
接受保加利亚大使涅加尔科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4 (1957年4月25日)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 ……16 (1957年4月26日)	
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7 (1957年4月26日)	
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18 (1957年4月27日)	

关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实习生问题的批语	21
(1957年4月27日)	
对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22
(1957年4月28日)	
关于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和按语	24
(1957年4月30日)	
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	26
(1957年4月)	
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36
(1957年5月4日)	
关于不再当本届国家主席的批语	39
(1957年5月5日)	
对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稿的批语	44
(1957年5月7日、11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46
(1957年5月8日)	
给李漱一的信	47
(1957年5月11日)	
蝶恋花·答李漱一	49
(1957年5月11日)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	51
(1957年5月14日)	
事情正在起变化	52
(1957年5月15日)	
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60
(1957年5月16日)	

接受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62
(1957年5月17日)	
接受蒙古大使苏诺姆·鲁布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64
(1957年5月17日)	
给达姆巴的信	65
(1957年5月20日)	
关于制止税收工作中违法乱纪行为的批语	67
(1957年5月24日)	
在接见共青团三大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68
(1957年5月25日)	
对转载《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文的批语	79
(1957年5月30日)	
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81
(1957年6月6日)	
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	83
(1957年6月6日)	
关于转载《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的批语	84
(1957年6月7日)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86
(1957年6月8日)	
在陈正人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意见 信上的批语	90
(1957年6月8日)	
给孙燕的信	91
(1957年6月8日)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93
(1957年6月10日)	
关于了解清华大学动态给蒋南翔、陈舜瑶的信	96
(1957年6月11日)	
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批语	97
(1957年6月13日)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99
(1957年6月14日)	
复达赖喇嘛电	102
(1957年6月14日)	
复班禅额尔德尼电	103
(1957年6月14日)	
关于发表赵一明发言的批语	104
(1957年6月16日)	
关于了解北师大情况给何锡麟的信	105
(1957年6月18日)	
对改进兵役工作指示稿的批语	106
(1957年6月20日)	
接受朝鲜大使李永镐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07
(1957年6月21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	108
(1957年6月)	
关于接待许志行给韶山乡的信	110
(1957年6月22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问题的批语	111
(1957年6月25日)	

对美国《新共和》杂志一篇文章的批语	112
(1957年6月26日)	
关于印发《整风专辑》的批语	113
(1957年6月27日)	
对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14
(1957年6月27日)	
关于转载和播发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的批语	115
(1957年6月28日)	
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	116
(1957年6月29日)	
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	117
(1957年6月)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124
(1957年7月1日)	
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	129
(1957年7月7日)	
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130
(1957年7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电报	132
(1957年7月9日)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134
(1957年7月9日)	
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150
(1957年7月18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56
(1957年7月20日)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158
(1957年7月)	
中央关于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	168
(1957年7月31日、8月1日)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170
(1957年8月1日)	
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	172
(1957年8月1日)	
给林克的信.....	174
(1957年8月4日)	
给刘松林的信.....	175
(1957年8月4日)	
给刘松林的信.....	176
(1957年8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	177
(1957年8月13日)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179
(1957年8月15日)	
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	180
(1957年8月18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	182
(1957年8月18日)	
关于同意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的批语	184
(1957年8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85
(1957年8月21日)	

祝贺马来亚独立的电报	187
(1957年8月30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188
(1957年8月31日)	
对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的批语	190
(1957年9月)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6
(1957年9月8日)	
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198
(1957年9月12日)	
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 语和修改	200
(1957年9月15日)	
为查找《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写的批语	202
(1957年9月15日)	
给陈云的信	203
(1957年9月16日)	
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	204
(1957年9月17日)	
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	205
(1957年9月19日)	
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207
(1957年9月20日)	
关于转载上海工商界批评高方的报道的批语	208
(1957年9月25日)	

关于印发《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的批语	209
(1957年9月30日)	
七绝·观潮	210
(1957年9月)	
国庆之夜会见各国贵宾时的谈话	211
(1957年10月1日)	
给林克的信	214
(1957年10月2日)	
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	216
(1957年10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的电报	218
(1957年10月6日)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220
(1957年10月9日)	
做革命的促进派	225
(1957年10月9日)	
对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的批语	239
(1957年10月9日)	
祝贺威廉·皮克连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242
(1957年10月9日)	
对探讨辩证逻辑对象问题的一篇文章的批语	243
(1957年10月11日)	
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	245
(1957年10月12日)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249
(1957年10月13日)	

致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电	264
(1957年10月17日)	
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命令	265
(1957年10月22日)	
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	266
(1957年10月26日)	
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	269
(1957年11月2日)	
关于公布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的命令	279
(1957年11月6日)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280
(1957年11月6日)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289
(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	
公布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的命令	311
(1957年11月14日)	
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	312
(1957年11月16日)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	318
(1957年11月17日)	
为感谢苏联人民的情谊给《真理报》的信	328
(1957年11月20日)	
给苏联领导人的感谢电	329
(1957年11月21日)	

祝贺诺沃提尼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330
(1957年11月21日)	
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	331
(1957年11月24日)	
给张明霞的信	332
(1957年11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和解放纪念日的电报	333
(1957年11月26日)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335
(1957年11月27日)	
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慰问电	337
(1957年12月4日)	
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	338
(1957年12月)	
祝贺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召开的电报	344
(1957年12月12日)	
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	345
(1957年12月14日)	
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给叶子龙的信	349
(1957年12月17日)	
给周世钊的信	352
(1957年12月17日)	
给李淑一的信	353
(1957年12月17日)	
给孙燕的信	354
(1957年12月17日)	

空军要全力以赴歼灭入侵之敌	356
(1957年12月18日)	
为空军题词	357
(1957年12月18日)	
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的电报	359
(1957年12月26日)	
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的批语	361
(1957年12月31日)	
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	362
(1957年)	
对《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新闻稿的批语	365
(1958年1月2日)	
祝贺缅甸独立十周年的电报	366
(1958年1月2日)	
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367
(1958年1月3日)	
对《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的批语	370
(1958年1月3日)	
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的批语	372
(1958年1月3日)	
在杭州会议上谈两类矛盾问题的讲话提纲	373
(1958年1月)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374
(1958年1月3日)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378
(1958年1月4日)	

对《烧砖土可代替水泥》一文的批语	397
(1958年1月9日)	
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	398
(1958年1月)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400
(1958年1月)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403
(1958年1月11日)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406
(1958年1月12日)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412
(1958年1月12日)	
祝贺毛雷尔当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电报	414
(1958年1月12日)	
《人民日报》不应“反冒进”	415
(1958年1月15日)	
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	418
(1958年1月19日)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422
(1958年1月21日)	
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的批注	434
(1958年1月)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给金日成的电报	438
(1958年1月24日)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441
(1958年1月24日)	

目 录

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442
(1958年1月28日)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445
(1958年1月28日)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	458
(1958年1月28日、30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	464
(1958年1月31日)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465
(1958年1月)	
在黄炎培关于提倡平地深葬的来信上的批语	484
(1958年1月)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批语	485
(1958年2月3日)	
对化工部关于第二个五年化肥预计发展报告的批语	488
(1958年2月3日)	
对杨勇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报告的批语	489
(1958年2月3日)	
给李讷的信	490
(1958年2月3日)	
对河北省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492
(1958年2月4日)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传达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报告的批语	493
(1958年2月7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495
(1958年2月7日)	

对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497
(1958年2月8日)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499
(1958年2月8日)	
关于古代官吏是否禁带眷属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503
(1958年2月10日)	
给陈玉英的信	505
(1958年2月11日)	
给杨开智的信	507
(1958年2月11日)	

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 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

(1957年4月19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作

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给袁水拍^[1]的信

(1957年4月20日)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2]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3]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4]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廿日

[1] 袁水拍，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

[2] 《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载于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3] 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载于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4] 李希凡，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重视，于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任编辑。



毛泽东致袁水拍信的手稿。



1957年4月，毛泽东接见解放军通讯兵首届技术竞赛大会代表。

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1]

(1957年4月21日)

—

赞成你的意见。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但迟一点解决也没有什么。要尽量努力，但也要准备迟一点。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日本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的台湾也是美国的问题。美国这个问题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解决的。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日本要取消军事基地，需要各个方面的朋友，需要和各个方面的合作，但是日本有很大的力量，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有可能首先争取到完全独立。世界有十个工业化的大国，日本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还算不上，印度也算不上，因为我们还没有工业化。你们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中国的力量是会增长的，现在还不行，但是有希望。中国的力量增长，对你们有利。现在的情况是，做生意也没有多少好做，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七年、八年、十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二

苏联建议在缔结原子弹的停止使用、减少生产和互相进行监督的协定之前，首先停止试验。英国要试验，可以在英国本国试验，不要拿到东方来试验，所以中国的和平团体可以支持你们的国民运动。太平洋是东方人的，英国的行动妨碍了我们，所以可以向英国有所表示。亚洲国家都怕原子弹，和你们是一样的。

还存在着美国的问题。所以即使日美安全条约废除了，日本完全独立自主了，日本、苏联、中国以及亚洲各国都有了和平条约，问题也还不能解决。我们可以劝美国，但美国不一定听。世界上还有美国，这是客观存在的力量。我看你们的路线完全正确，是亚非国家友好的路线，不是和西方国家建立同盟。历史上你们和西方建立过同盟，如和英国。日英同盟还是平等的同盟，现在却和美国建立了不平等的同盟。现在唯一的道路就是不和美国合作，而和亚洲国家和平友好。但是美国有原子弹，它要打仗你怎么办？所以防御还是需要的，你们也需要。其他国家都听话，就是美国不听话，你怎么办？美国有两条路，一是听话，这很好；一是不听。全世界能团结起来，使美国听话最好。苏联已提出停止核试验，问题是美国不停怎么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美国力量强大了，就是美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对立。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仅在你们一个国家有，在我们的台湾也有，欧洲、非洲、亚洲都有。美国到哪个地方都建立军事基地，这是很显著的。当然美国也搞原子弹、氢弹，将来中国也搞，日本也搞，印度也搞，但美国不怕我们，它比我们快，数量比我们多。当然，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他们有、

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美国既然有了，苏联也有，就使得仗打不起来。假如只有它一个国家有，它就可以拿来吓唬人家，它向哪个国一显示，哪个国就得跟它走。我们看看美国的做法：在南美、中美有泛美公约；为了反对日本，美国和澳洲、新西兰搞三角同盟；为对付中苏，和日本搞了一个日美安全条约；它又在东南亚搞东南亚条约，在中东搞巴格达条约；在非洲它想搞垮纳赛尔^[1]，在欧洲搞北大西洋公约。美国有几十只手，几百只手，控制了很多地方，南朝鲜有它的军事基地，台湾它也控制。

三

还有一点我想谈谈，就是关于人民力量的问题。人民力量一定要胜过反人民力量。比如社会党有什么力量呢？就是靠人民嘛。你们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执政，从钱上说你们也没有大银行。我们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我们在延安时，只有几根破枪，国民党有四百多万军队，又有美国援助，但是我们打胜了。再以印度为例，英国很强，又有资本，但也撤走了。这就是人民运动的力量，尼赫鲁^[2]就是靠人民力量把英国赶走了，英国没办法，只好走。这就可以得出个结论：美国钢铁多，有原子弹、氢弹，但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美国，在政治上不得人心，人民不赞成美国。

[1] 纳赛尔，当时任埃及共和国总统。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1957年4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时和团长浅沼稻次郎交谈。

给达赖喇嘛^[1]的复电和对复电稿的批语

(1957年4月22日)

—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四月一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

你同班禅额尔德尼^[2]出国参加释迦牟尼^[3]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3] 释迦牟尼，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

二

分复为好。退徐冰办理。^[1]

毛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请示信上写的批语。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徐冰在报送统战部代拟的给达赖喇嘛的复电时，曾建议用毛、刘、周、朱4个人的名义合发一份复电。

接受瑞士大使贝努义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4月22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所递交的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国书，并对您所转达的瑞士联邦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我个人的祝贺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一直对瑞士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瑞士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永久中立国家在维护和平方面所作的贡献。

值得欣慰的是，从1950年中、瑞建交以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已有了发展。我国驻贵国公使馆已于去年年初升格为大使馆。在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方面，诚如大使先生所说，也有了加强。大使先生，这些成就无疑同您在担任联邦驻我国公使期间所做努力是分不开的。现在贵国政府已将驻我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我相信这将使中、瑞间已存在的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瑞士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加强中、瑞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定将获得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预祝阁下在工作中继续获得成功，并祝贵国人民幸福和元首健康。

对中央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 文件的批语稿的修改和说明^[1]

(1957年4月23日)

一

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就已经提出全面检查的要求。

二

彭真、小平^[2]再阅，尚昆^[3]办。

必须把目的提出，因此加了几句话。

毛泽东

四月廿三日

[1]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7年4月22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时加写和改写文字。中央转发的文件有：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准备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3.《公安部党组关于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在检查工作中，应注意：（一）这次全面检查，主要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和是否依法办事的问题进行典型和重点检查，而不是对过去所有的案件一一复查。（二）全面检查的对象是犯人尚在关押、劳改、被管制中的案件，检查的重点是冤案和错案。由于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采取了比过去更为宽大的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绝不能用现在的量刑尺度衡量过去已经判决的案件，甚至改判过去的案件。（三）检查肃反工作一般应该由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司法机关进行，同时必须吸收被检查单位参加肃反斗争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但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单独地同被斗争的对象和别人谈话，或任何人要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单独谈话，均不得阻挠。（四）在检查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检查好的典型，又要检查坏的和中等的典型，要介绍工作中的成绩和优点，也要介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以往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要批评，对违法乱纪行为应作适当的处理，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五）领导肃反运动的十人小组，是领导群众进行肃清反革命运动的组织，任务是领导群众清查、检举反革命分子。它不是司法机关，不担负对犯人的逮捕、起诉、审判工作。批语还要求各级党委应当重视这次检查工作，切实领导和督促十人小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这一工作。各地对检查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应该随时报告中央，并于检查结束后，向中央做总结报告。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修改中央批语稿所作的说明。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接受保加利亚大使涅加尔科夫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4月25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递交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对您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保加利亚人民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和自由并且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人民，保加利亚人民是经过长期的反对外国压迫的英勇斗争而获得解放的。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十二年中，保加利亚人民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保加利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和合作化农业的工业——农业国。保加利亚在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般的保加利亚人民的这些成就和贡献深为钦佩，并且感到欢欣鼓舞。

近年来，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深信，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上，这种友谊和合作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接受保加利亚大使涅加尔科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和加强中保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 理论水平的批语^[1]

(1957年4月26日)

乔木^[2]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1957年4月24日《大公报》的报头上。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4月26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平恢复两年多以来，越南人民又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恢复和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越南人民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及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定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诚如大使同志所说，很久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就在兄弟般的真诚的友谊和合作中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接触往来日益扩大和发展。我深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 参加劳动的指示

(1957年4月27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1]，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2]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

[1] 指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同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0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同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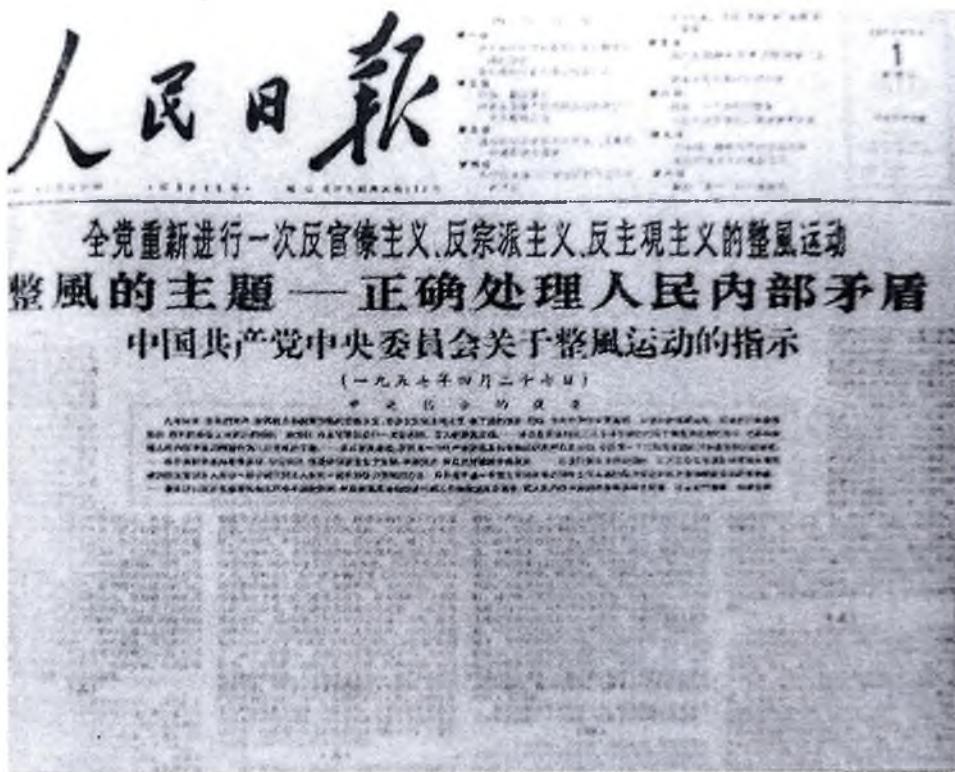
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1]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2]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1] 指新华社1957年4月23日发的关于湖北省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道。报道说，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一、农业合作社内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群众不满。二、一些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三、在占用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耕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四、地方干部与转业军人相处不好，发生纠纷。五、城镇中学政治空气薄弱、校风校纪不正，引起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对政府和学校领导严重不满。有些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引起学生闹事。六、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2] 指中共中央1957年4月19日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及《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一文。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重新开展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图为《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

关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实习生问题的批语^[1]

(1957年4月27日)

陈云^[2]同志：

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1957年4月18日关于我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上。报告说，目前，我驻苏人员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工作、学习也是积极的。但自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在相当一部分人员（主要是留学生）中，产生了一些偏激情绪。有不少学生失去了在苏联学习的信心，要求回国学习和实习的学生增多。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4月28日)

—

即送刘、朱、陈、乔木^[2]阅，尚昆^[3]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4]。

毛

四月廿八日一时

[1] 本篇二、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于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二

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

三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关于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一文的批语和按语^[1]

(1957年4月30日)

—

送乔木^[2]同志：

此篇^[3]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四月卅日

—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

[1] 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载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代《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指李汝祺发表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1]，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1] 毛泽东替李汝祺的文章重拟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经毛泽东推荐，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

(1957年4月)

一、最高国务会议、宣传会议以后，知识分子情况：紧张空气比较缓和，党外知识分子初步和我们接近起来，犹豫情绪比较开朗，报告不是万灵药，还要用各人的药，要的东西不给他们，就处于被动，给了以后，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的。我们的办法是先整自己，把党整好，整得谦虚一些，讲道理。现在的问题就不是我们的问题。知识分子左派向我们要民主，学生向教授要民主，那时就要求救于我们。我们一放，他们自己就鸣起来，我们一紧，就向我们要。

民主党派，上海去年发展一万一千多，他们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只有无产阶级不怕政变，错了，就改。他们中间问题就多起来了。

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谁让我们有教条主义，攻掉就好，攻得过火，“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我们想一想。陈毅同志三反时说：我们专政专了这么多年，让人骂一个星期也可以。问题是倾盆大雨那样向我们倒来，我们也会大吃一惊。有些知识分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对。共产党威信高，报上只要一二句话，风吹草动，就有人怕。党外怕，党内也怕。事情对，也要谦虚三分。压力

大，自己要懂。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我们现在让人批评，以后再去分析。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一定要看，可能看二十年。党内也看，例如治病救人，有人不相信，直到后来看了事实，才相信。要经过许多考验，共产党的政治要受考验，领导者要受被领导者的考验。过去知识分子为旧统治者服务，现在生产关系改变，没有社会基础了。知识分子过去是寄托在封建、资本主义、个体生产制。知识分子出身哪个阶级，为哪个阶级服务。出身的阶级现在已破坏，吊在半空中，脚不踏实地。他们现在爬在我们的身上。工农通过共产党让他们做事，帮他们吃饭。我们还要用十几年洗脑筋，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他们想不要批评，说不出口来。现在有一千多万人悬在半空中，他们的脑筋是旧的，没有什么可怕。吊在半空中，很需要我们伸出手去接一把，如果我们热情地伸出手去，可以快一些。大部分过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最欢迎变化的是无产阶级。农民最希望蒋介石、美帝、地主起变化，但不希望小私有制起变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看到文化革命来得太突然太急，也可能变。毛脱了皮，但魂还在旧的皮上，毛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他们常常魂魄不安。不变不会不安，不安是变的表现。有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长期不可能改变……考验作家的世界观，就是要考验他们能否与工农打成一片，还是两片，下乡能不能和农民说真话。党内的官僚主义者世界观也成问题，脱离群众。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又与群众格格不入，那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上有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乱，有反共思想，主张打出去。改造要几十年，有些人到死不改，大部分可改。有那么一部分老顽固，到死不改。

二、一定要放。怕放是道理没有讲通，或没有说服。这是有领

导的反官僚主义。凡是不让放，毫无准备，结果大放。我们主张放，最大乱处无非是乱一阵。为人民办事，人民还是不满意，有人想不通，苦恼得很。总有人不满意，有满意有不满意。比过去他满意，比将来或比现在好的那些人他又不满意。这种情况一年以后也还有。如果都满意了，我们只要去睡觉好了。现在还没有放，怎么知道就要乱呢？过去阶级斗争，警惕性太高了，现在右一下子。一家独鸣了多少年，让他乱一下子看看。明显的错误，长期不批评是不好的。草多可以用拖拉机，蒋介石不是草，三年就打倒。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十懂马克思主义，百分之八十是爱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可见毒草只是少数，似毒非毒、野草香花中间的是多数。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个问题是新问题，干部还没有试过，试一试，试出味道来，顾虑就没有了。要是讲清楚，人民还会反对共产党吗？似毒非毒的是大多数，毒草是少数。

我不是鼓励人民闹事，搞闹事促进会。闹事打办公室要处分。乱糟，偏有一点。现在是党外情绪高，过些时，党内情绪也会高起来，先低后高。

解决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经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政策都是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的，应该让干部去工作中试一试。

又怕又不怕，又高兴又不高兴，问题解决又不解决，这就是辩证法。比如打仗，开始提心吊胆，越打下去越大胆，没有几次路线错误，就不会现在这么好。好事多了，会骄傲，就会出坏事。苏联就是如此。王明错误大，没有自我检讨，没有威信。错了，紧张一礼拜，检讨了，就好了，还有免疫作用。邓老对合作化问题，我想彻底攻他的。对干部帮助的办法，就是攻。最多失掉一票，不想提

名我。

巴金说杂文难写。一、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风气。二、彻底唯物论者是不怕的。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应帮他，不帮忙是站不住的。

鲁迅墓搞个运动场有什么不好？陈其通、钟惦棐代表两个片面。我也是片面无忧论……可以变成循环论，但辩证法不是循环论。

片面性多了，就要出辩证法。这些人无非要我们倒霉，我们就想得更坏一点。现在好像右了一些，但说服群众，不能简单化办法，对闹事不是彻底解决。事情处理过分了，不行。谁说要看牛鬼蛇神？是群众要看。不能压，只有多演好戏。应该让社会复杂一些，把重心放在科学上面。有人说开除闹事学生比国民党还毒辣，我们应该比国民党高明一些，有一个国民党和我们比较，很好。他们是在掘坟墓，我们不要学国民党。阻止广东学生来京请愿，我至今也难受。国民党对人民专政，共产党讲民主，这点应清楚。有人拿专政的原子弹向人民的头上晃一晃，这是不好的。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人认为不是时候，与政治思想工作有矛盾。大规模政治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大做了结论。这个方针提出正是时候。

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很深。我想是说没有一条沟，没有界限是不好的，但不能成为一条沟，有沟，就脱离群众。

上海工厂有千分之一，没有万分之一闹事，有百分之一就好了。可以清除官僚主义。

从党内到党外。党内党外一起讲，戏就唱起来了，这样，可以把许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要整一整。

有人感到左不行右不行，难办。知道难办就好，就会动脑筋，否则就只说专政，说集中。

党内要不要斗争，当然要斗争。农民年年锄草，批评错误要有说服力，不能靠压。靠几篇文章不行，要以理服人，不要靠资格。

对敌讲力量，对人民讲理。没有理，不会历史主义，地位多高，不行。要多学习，多研究。干部摆资格，讲势力，是很危险的。

没有民主党派行不行？也行，苏联就没有。听不到反面意见，但打仗还是打胜了，也没有杀知识分子。苏联不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都是大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并没有农工。要给他们事做。

两头团结，中间批评。没有批评就是右倾。钟惦棐文章出来很久没有批评。

《文汇报》上批评要全面分析，这批评是有益的。

对民主党派人士要讲真话，有缺点就说。当民主党派也有苦处，听不到，看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也可以讲一些党的缺点。我们要打倒民主人士，他们就反起来。虚心学习，很有必要。

开了许多会议，不发消息。《人民日报》这是《国民日报》。

陈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党内同志，我就没有群众基础。

党内外应当有一条线，不应当有一道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见党外人士，把底亮出来，诱敌深入，也可以讲，不讲是不民主。让讲又是诱敌深入，怎么办？要从六亿人口出发，我们野心要大一点，知识分子有五百万，要争取他们。莫朴是宗派主义者，要交审，要审查党籍，为什么不要国画？他是搞丑术，不是搞美术。国民党还有国画。他是什么党，大概是第三个党吧？社会存在不能否认。社会存在有反革命，我们就要肃反。民主范围内的问题早已存

在。火烧红莲寺也要采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怎么行？江丰、莫朴搞辩证法，为什么不要国画？只搞单干户？夫妻也要配对嘛！老干部要考虑，过去是一套办法，现在要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新民报》看了几张，不是黄色报纸，软一点。不能领导科学，不要一下子顶回去，要请教，刘备还要请个诸葛亮。党外人士讲话是考虑过的。有时有错误，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不要说死了。

四、关于几个问题的认识问题。

范瑞娟文章有二百多封信反对，我看没有黄色，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1]怎么办？写文章要有逼，毛骡子没有人骑不行。领导、选报、准备、说服力、有利五个条件。这么多条件，只有说服力比较具体，其他的都很难改，但不要教条主义。

对党的政策能否辩论，《人民日报》的文章组织都对？陈其通等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有些难办的事情，不成堆也不行。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有二百多口口反对，可见是少数。报纸上也不能天天打气。一年开四次会，春夏秋冬。文教事业是教育人民的东西，要经常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电影厂有人说力争香花，不出毒草。这精神不对，我们不怕出三分之一毒草，避免毒草是一句空话。

片面性。要求党外都避免片面性，都成为辩证法专家，一万年

[1] 1957年3月，艺人范瑞娟的文章由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但题目由《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变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3月24日，上海的《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风波。

也是不可能的。上次我从自己谈起过。工作做得好，做得不好，永远存在。

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该争取三分之一到党内来。民主党派可以跨党，领导人员不要入党，六年内搞四分之一，三个五年计划三分之一入党。今年争取百分之十五入党，要稳步。今年如果不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如果组织上关门，那是不相称的。我们党没有大作家、大诗人、大教授，要招兵。过去办不到，现在要努力。高尔基只读二年书，孙中山也没有受很高的教育，人是可以培养的。

教育上摇摆不定，有道理。没有经验，摇几次，就不摇了。初中教材中，应当有历史、地理、文物等等。过去中小学就学外国文，应该学。初中课太多，应该砍掉三分之一。学校教课怎么百家争鸣？应以一个为主或几个为主。

肃反检查是查五五、五六年的，过去的不查了。

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矛盾，这句话不对。

节育问题。马尔萨斯结论不对，可是人多是否一定要打仗？中国节育要看省份。江苏人多，东北人少。婚姻法不要改，多劝说不要早婚。

一千年还有革命，我说过，但不一定。

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将来不叫国有化，是公有化的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就会被推翻。现在已有个别的乡政府、支部。

五、领导问题。要改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共产党的责任。不怪宣传部，要第一书记负责。第一书

记不仅要抓思想领导，还要看文章，要看历史、哲学、文学……历史分期。人家锣鼓喧天，第一书记什么都没有看，怎么解决？有人说，旁的事少干一些，抓思想工作，要看刊物，看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养成习惯，慢慢就有兴趣。党内也要讨论，讨论没有时间，不讨论也会没有时间。有人把“百家争鸣”念成“争鸣”。不懂要接接班，周瑜二十多岁，程普五十多岁，大敌当前，谁挂帅？搞文教工作，要有文化。诸葛亮初时不被重用，后来用了。那时能破格任用，现在为什么不行？去年评级，有人意见很多，破格提升有很多阻碍。当兵的没有文化，可难，可也要业余学习。现在是打另外一个仗。各级的将、校、尉、官兵要重新配备。各级干部要学会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不然，大将出马，耍了两下子，枪杆子就掉到地下去了。大学党委会要改组，接受干部任务完了，现在可调出来，有个把留在学校里搞搞事务，“百家争鸣”，不要去当校长。

要做宣传工作，逼上梁山讲，要到大学里去讲，先与教师、学生谈谈。今天不讲，明天不讲，今年不讲，明年不讲，一万年不讲，怎么行？

高教部长、宣传部长、党委书记都请去讲，总比政治教员好一些。

定息问题。企业性质改变了，两重性质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但灵魂还在。定息搞短搞少，长期留一个口实，不合算。现在一年还一亿，还十年，将来还一千万。他们不要求取消，我们就还下去。小的资产阶级要摘帽子，不要小的一摘，大的不安，最后总归自动取消。

六亿人口中有缺点的，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不对可以不

听，对的要接受。反对肃反、反对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驳一驳。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孙大雨说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报上登出来。胡风、铁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就脱离群众，这也是帮助的一种办法。做政治工作要有一点办法，不怕发表，要驳他。

各省要交流经验，不要不相往来。



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机场和访华归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话别。

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 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1957年5月4日)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

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山公园和各界青年欢度青年节。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市庆祝青年节晚会上跳舞。

关于不再当本届国家主席的批语^[1]

(1957年5月5日)

—

刘、周、朱、陈、邓、彭真^[2]阅，小平办。

此件^[3]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毛泽东

五月五日上午十时

[1] 1957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二届人大不提名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5月5日，毛泽东在看这封信时，在信中写了四条批注并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即本篇三，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此外还有两件批语，即本篇一、二，这两件批语分别写在单页纸上和陈叔通、黄炎培的信的第一页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指经毛泽东批注的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

此事^[1]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二

刘、周、朱、陈、邓、彭真阅，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

毛泽东

五日

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

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

三

少奇委员长：

恩来主席：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

[1] 指毛泽东关于下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不再提名选举他为国家主席的建议。

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毛泽东注）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毛泽东注）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毛泽东注）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毛泽东注）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节，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至于领导上工作太长期高度紧张，这点确值得大大注意，今后必须在安排对内对外工作时，尽可能使倾向宽舒，似乎各位领导者

都有这样必要。如荷同意，亦乞通知进行。

披沥直陈，统希亮察。

顺致

崇敬！

陈叔通

黄炎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1957年，毛泽东和黄炎培、陈叔通在一起。

对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 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稿的批语^[1]

(1957年5月7日、11日)

—

伯达^[2]阅，小平^[3]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4]，在报上发表。

毛泽东
五月七日

在第四页上有一些修改^[5]。

[1] 本篇一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上。这一初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毛泽东于5月11日又作了批示，即本篇二。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再次审阅这一指示稿时，将文件的日期定为“1957年5月10日”。

[5] 毛泽东在指示初稿第四页上只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二

可用。公开发表^[1]。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1] 这一指示发表于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国庆的电报

(1957年5月8日)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今天致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萨波托斯基、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和总理威·西罗基，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

贺电说，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纪念的时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为这些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不久以前，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我们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文化合作协定和保健合作协定。这不但对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捷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也有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贺电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给李淑一^[1]的信

(1957年5月11日)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輩后輩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2]所述那一首^[3]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4]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

[1] 李淑一（1901—1997），湖南长沙人，柳直荀的夫人，当时是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

[2] 开慧，即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夫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牺牲。

[3] 指《虞美人·枕上》（《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4] 直荀，即柳直荀（1898—1932），湖南长沙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9月在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被害。

亭^[1]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1] 柳午亭（1877—1957），湖南长沙人，柳直荀的父亲。

蝶恋花·答李淑一^[1]

(1957年5月11日)

我失骄杨^[2]君失柳，
杨柳轻飏^[3]直上重霄九^[4]。
问讯吴刚^[5]何所有，

[1] 答李淑一，这首词是毛泽东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词中的“柳”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烈士（1898—1932），湖南长沙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曾任红军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9月在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被害。1957年2月，李淑一把她写的纪念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词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了这首词答她。

[2] 骄杨，指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后随毛泽东去上海、武汉等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隐蔽在长沙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牺牲。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将该词手书送给毛岸青、邵华时，将“骄杨”和“泪飞”分别写作“杨花”和“泪挥”。

[3] 翁，飘扬。

[4] 重霄九，九重霄，天的最高处。我国古代神话认为天有九重。

[5] 吴刚，神话中月亮里的一个仙人。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月亮里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桂树，吴刚被罚到那里砍树。桂树随砍随合，所以吴刚永远砍不断。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1]舒广袖^[2]，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3]

[1] 嫦娥，神话中月亮里的女仙。据《淮南子·览冥训》，嫦娥（一作姮娥、恒娥）是羿的妻子，因为偷吃了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到的长生不死药而飞入月中。

[2] 舒广袖，伸展宽大的袖子。

[3]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忽然听到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捷报，两位烈士的忠魂顿然高兴得泪流如雨。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毛泽东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

我失骄阳君失柳，
柳暗花明又一村。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1]

(1957年5月14日)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2]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1] 这个批语写在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解放日报》于1957年5月8日邀请22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5月10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事情正在起变化^[1]

(1957年5月15日)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

[1]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由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

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

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

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哪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赴京演出的琼剧演员。



《观看演出以后》(中国画)

中央关于对待当前 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1957年5月16日)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

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1]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1] 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会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露暴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但是，有三类言论的报道必须加以控制：（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接受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5月17日)

我很愉快地接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任命你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对你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勤劳、勇敢并且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在解放后的十二年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久以前，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匈牙利反动分子利用广大人民对过去领导所犯的错误的不满，策动了一个企图推翻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但是，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依靠苏联的国际主义的援助，彻底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匈牙利人民的这个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团结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民主力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作了许多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深信，匈牙利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沿着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中国人民一向密切关怀匈牙利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事业所进行的斗争。并且把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人民在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永远可以指望六亿中国人民的衷心的支持。匈牙利人民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直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中国人民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增长，不但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将加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你出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你为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你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你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接受蒙古大使苏诺姆·鲁布桑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5月17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委任你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向你表示热烈的欢迎。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获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几年来，中蒙两国人民的真诚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中蒙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并且对增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也具有重大意义。大使同志，在你为巩固和发展中蒙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工作中，一定能够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预祝你的工作获得成功。

给达姆巴^[1]的信

(1957年5月20日)

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给我的来信。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時候，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派來政府代表團參加慶祝盛典，我們感到非常高興，謹致謝意。

我們研究了你在來信中提到的由中國供給蒙古人民共和國勞動力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應該做的。但是，如你們所設想的，大量遷移我國內蒙古自治區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國定居，是有困難的。因為我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居民有八百七十萬人，其中七百多萬人是漢族，而蒙族同胞僅有一百多萬人。其次，我們考慮，如果從中國動員勞動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國從事生產建設，我們也只能够動員從事工業和農業的勞動力前往，而動員從事牧畜業的勞動力是有困難的。所以，我們設想，只能動員漢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工、農業方面需要勞動力的部門的工作。即便如此，我們每年能夠派去的人數也不能很多。因為人數過多，在語言方面，在生活習慣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會有困難的。我們設

[1] 达姆巴，即德·达姆巴（1908—1989），今译达希·丹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一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汉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团结合作，我们准备每年在派去的劳动力中调配几十名懂蒙、汉两种语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管理机构联系，从而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

目前，我们已经派有八千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

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5月20日

关于制止税收工作中 违法乱纪行为的批语^[1]

(1957年5月24日)

陈云^[2]同志阅后，转李先念^[3]同志阅，退毛。

我看此种现象不但福建有，各省都可能有，似宜采取措施，加以处理。可否举行一些典型调查，然后制定一个法令。不然，如福建那样，是危险的。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1957年5月21日第一一八号上。这份简报摘报了福建省监察厅党组关于晋江专区税收工作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简报说：福建省监察厅等单位最近重点检查晋江、大田等7个县的税收工作，发现违犯政策、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护税组织胡作乱为，随便拘人、扣货、变卖商品、动用税款。二、滥施处罚。三、不经批准，滥行搜查。李先念看了毛泽东批阅的这份简报后，于5月29日向陈云、毛泽东建议将福建省的这个报告转发各省市。1957年6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3]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在接见共青团三大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

(1957年5月25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列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

[1]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还决定把改名以后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历次代表大会衔接起来，依照次序加以排列，并确定下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名称为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毛泽东在接见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1957年5月，毛泽东接见各民族学生代表。



1957年5月，毛泽东和各民族青年代表在一起。



1957年5月，毛泽东和蒙古族、布依族、彝族女青年在一起。



1957年5月，毛泽东和青年团代表在一起。



1957年5月，毛泽东和青年团代表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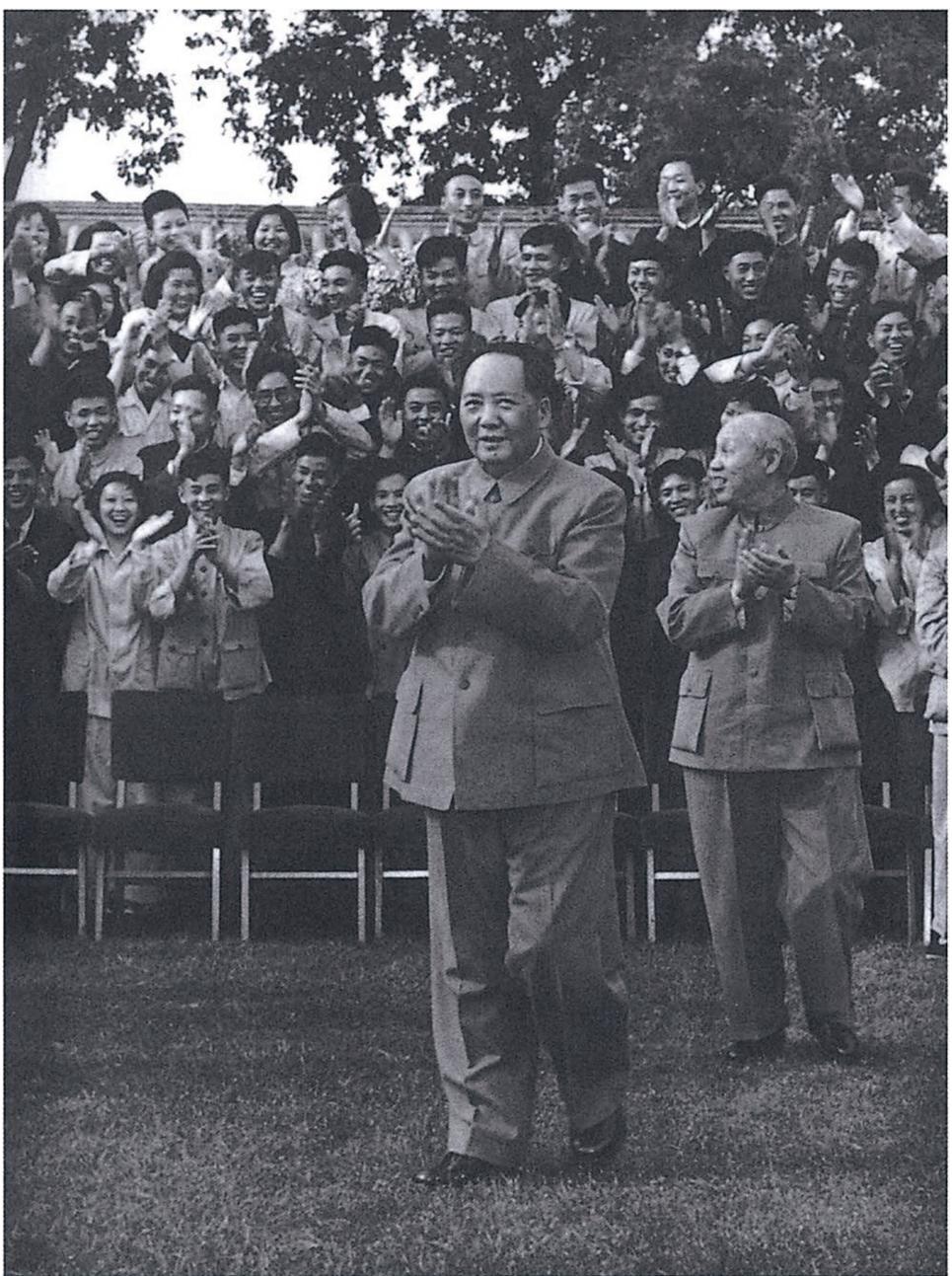
1957年5月，毛泽东和青年团代表在一起。



《毛主席，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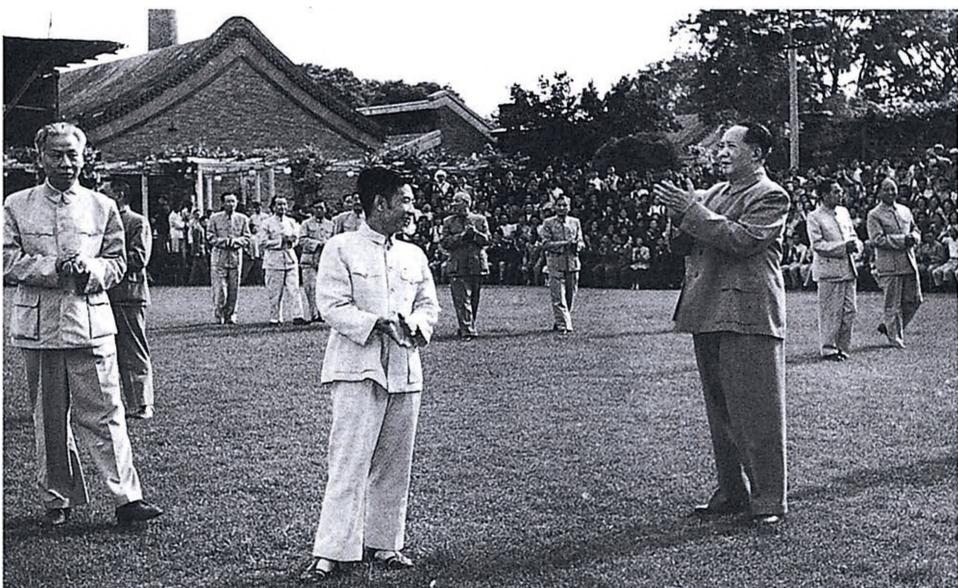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青年团代表。



1957年5月，毛泽东和董必武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7年5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代会代表时讲话。



1957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后田暴动队员张龙地。中为邓子恢。



1957年，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吕厚民在一起。

对转载《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 一文的批语

(1957年5月30日)

乔木同志：

此篇^[1]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卅日

[1] 指《新闻日报》1957年5月29日刊载的小雅写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在整风运动中，章乃器于1957年5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文章说：“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小雅不同意章乃器的这些说法，他在文章中说，所谓“特种性格”“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所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

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于“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看了斯大林的话，竟飘飘然以“特殊”自居了，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不能据此就把斯大林的话贬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根据毛泽东的批语，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957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和夫人。

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1957年6月6日)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1]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

[1]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6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

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1]

(1957年6月6日)

尚昆^[2]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

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泽东

六月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57年6月5日为报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90%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转载《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1]一文的批语

(1957年6月7日)

[1] 《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作者笪移今，登载于1957年6月6日的《文汇报》上。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对待整风应做到：第一，要认识党有伟大的气魄。党是以全国人民意见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是大公无私、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是党的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某些党性不纯的党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从团结人民出发所产生的后果。整风，就是党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克服缺点的决心。第二，要学习整风文件。学好文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置身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时代中，使我们善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善于识别社会演变的方向，善于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懂得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第三，要掌握和风细雨的精神。现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搞好团结。要接受过去运动有些过火批评的教训。第四，要明辨是非。非党人士帮助整风，要在接受党的领导下，要在不与党对立的认识下，监督党贯彻整风政策。既要大胆批评，又要避免冤枉人，发现批评离事实太远，要出来说话。第五，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协助领导共同解决矛盾，缩小矛盾。对于人民提出的过高要求，对于暂时办不到的事情，知识分子更应该用笔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第六，要从帮助整风来改造自己。第七，要领会整风运动的实质。整风的目的就是巩固党的威信，加强党的战斗力量，使党能更有效地团结六亿人民，充分贡献力量，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不能把扩大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这篇文章，后来未见转载。

关于转载《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的批语

乔木^[1]同志：

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

毛

六月七日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

(1957年6月8日)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

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以此为契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拉开序幕。

在陈正人^[1]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 意见信上的批语

(1957年6月8日)

陈伯达^[2]同志：

此件^[3]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

毛泽东
六月八日

[1]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指陈正人1957年6月7日写给毛泽东的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意见信。信中建议在稿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一句前面加上“革命时期”4个字。并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两个革命——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胜利，革命（社会改革）已基本结束，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斗争，不但表现为长期的思想上的斗争，也表现为政治的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如经济的）”。后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采纳了这一建议。

给孙燕^[1]的信

(1957年6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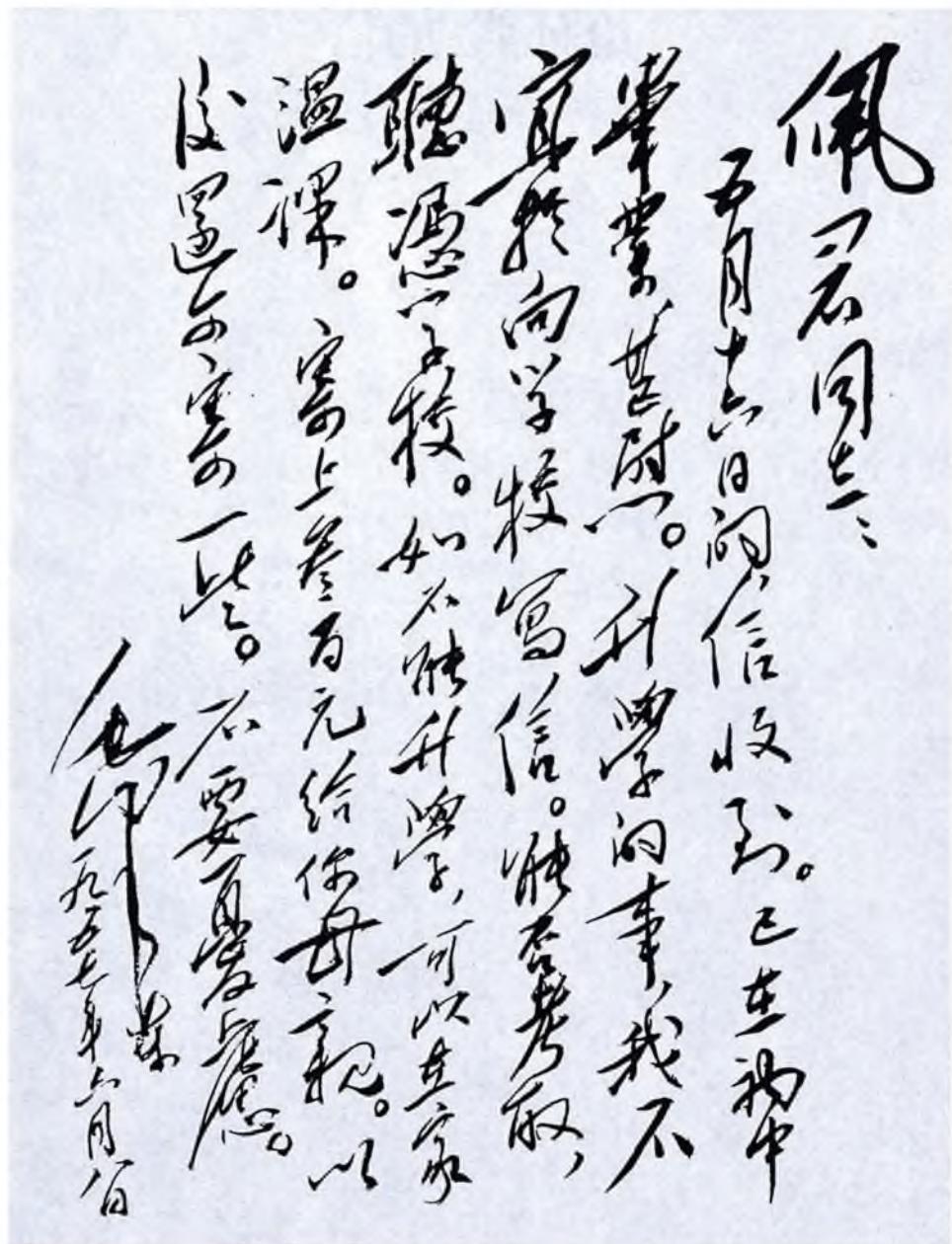
佩君同志：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1] 孙燕，学名孙佩君。她的母亲陈玉英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毛泽东致孙燕信的手稿。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 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1957年6月10日)

—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一) 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二) 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 善意欢迎；(2) 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 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

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1]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2]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

[1] 章乃器，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康年，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

[2] 章伯钧，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二

即送刘、周、陈、朱^[1]阅，尚昆^[2]用电报发出。

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指朱德。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了解清华大学动态 给蒋南翔、陈舜瑤^[1]的信

(1957年6月11日)

南翔、舜瑶同志：

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

[1] 蒋南翔，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陈舜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兼副教务长。

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批语^[1]

(1957年6月13日)

—

乔木^[2]同志：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内〈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

—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

[1] 这两条批语写在1957年6月12日《北京日报》第一版上。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对待』批评”^[1]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

[1] 这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清样稿）的题目。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这篇社论发表在195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上。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

(1957年6月14日)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2]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

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载于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2] 指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文章说，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例如，毛泽东1957年5月25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毛泽东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

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文汇报的标题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再如，李维汉 1957 年 6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用“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文章批评了文汇报上述这些做法和“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观点，认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复达赖喇嘛^[1]电

(1957年6月14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五月二十三日拍给我的电报收到了。谢谢。

西藏和平解放六年以来，在你和班禅额尔德尼^[2]的领导下，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伟大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望你继续努力，把西藏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进一步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3]，使西藏更加团结、进步和发展。

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3]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17条。

复班禅额尔德尼^[1]电

(1957年6月14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周年的時候，拍給我的電報收到了。
對你的祝賀，致以謝意。

西藏在和平解放以來的六年期間，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績。但是建設西藏還是有不少困難的，希望你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協助達賴喇嘛^[2]領導、團結各方面的愛國進步的力量，一道前進，在執行協議十七條^[3]、建設西藏的工作中作出更好的貢獻。

祝你身體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1] 班禪額爾德尼，即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西藏宗教領袖之一，當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

[2] 达賴喇嘛，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領袖之一，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3]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簽訂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有17條。

关于发表赵一明^[1]发言的批语

(1957年6月16日)

彭真、维汉^[2]同志：

请彭查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3]，是否已经在成都报上发表。如已发表，请告新华社用新闻形式转发；如未发表，请商李井泉^[4]争取发表，然后新华社再发表。

毛泽东

六月十六日

[1] 赵一明，当时任民盟四川省委副书记。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指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1957年6月15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言揭露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同年4月民盟中央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一些言论及其对民盟地方组织的影响。6月16日，《四川日报》刊登了这一发言。6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4]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了解北师大情况给何锡麟^[1]的信

(1957年6月18日)

何锡麟同志：

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你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八日

[1] 何锡麟，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

对改进兵役工作指示稿的批语^[1]

(1957年6月20日)

同意。^[2]

刘、周、朱、陈、小平、彭真^[3]即阅。退彭德怀同志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7年6月19日送呈报告的批语。

[2] 彭德怀呈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规定：把民兵与预备役合而为一，民兵即预备役。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接受朝鲜大使李永镐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6月21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你递交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国书，并且感谢你热诚的祝贺。

中国人民经常关心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成就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为实现朝鲜的国家统一、为建立朝鲜南部和北部之间的联系所提出的许多合理建议，不仅为全体朝鲜人民所拥护，而且也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近年来，朝鲜国家领导人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对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有重大意义。

几年来，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已经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中国人民将继续加强同朝鲜人民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的事业继续给予支持。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你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你的工作中，你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 《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6月)

一

即送乔木^[2]同志照办。

二

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

[1] 《不平常的春天》是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此文一、二两次清样稿时，都作了修改。本篇一是毛泽东对第二次清样稿作了修改后写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在清样稿上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三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关于接待许志行给韶山乡的信

(1957年6月22日)

韶山乡人民委员会 各同志：
生产合作社委员会

许志行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是上海学校的教师。他在几十年前曾在湖南读书，并且到韶山住过一个暑期。他现在再到你们那里来看看，请你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问候你们！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问题的批语^[1]

(1957年6月25日)

即送周总理：

在讲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家的改造尚未完成。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早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主要是在几处提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面，加写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9个字。

对美国《新共和》杂志 一篇文章的批语^[1]

(1957年6月26日)

陈云^[2]同志：

17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有人提议农业投资应占20%，少了不利，请你研究一下。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早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参考资料》1957年6月24日第一四三五期封面上。该期第17页至19页刊载了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的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文章。文章在“垮台论”的小标题下，一开头便说：“‘一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在旁边批示，“这一句请你研究一下——毛”，并给陈云写了这一批语。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印发《整风专辑》的批语

(1957年6月27日)

小平^[1]同志：

情况简报的《整风专辑》很有用。现请：（一）将六月十五日至六月廿五日共十一天的“专辑”立即印成一集（印成一本），印若干份，用飞机火车迅即分送各省市委及地市委，每单位『有』多的有十几本，少的有三四本即够，供其参考。（二）以后每三天印一集，分送。如你同意的话，请照办为盼！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八时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 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 报告的批语

(1957年6月27日)

小平同志：

此件^⑩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

[1] 指谭震林1957年6月24日关于在湖南省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他在老家湖南省攸县住了40多天，根据民主办社的方针，亲自领导整顿了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整社中发现，目前社员最关心的，也是社员、社干部之间造成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的财务管理不民主，账目不公开，从而引起社员对社干部的很大怀疑。通过财务清算，公布账目，并且对少数贪污、占小便宜的干部进行适当的批评和处理后，社员的怀疑解除了，生产情绪提高了，同干部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关于县级机关整风问题，报告说，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一是干部的特权思想较严重，二是在工作中存在狭隘的阶级观点，三是官僚主义发展到不愿动手动脚的地步，写东西都推给秘书干事，县级干部下农村的时间很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中央规定县级干部一年应有6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县级机关整风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关于转载和播发

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的批语

(1957年6月28日)

乔木^[1]同志：

郭沫若此篇^[2]，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3]，新华社全文播发。

毛泽东
六月廿八日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的关于反击右派的谈话，题为《拨开云雾见青天》。载于195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3] 郭沫若的这篇谈话，195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题目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1]

(1957年6月29日)

一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1] 本篇一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文字。

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

(1957年6月)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过去好像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蒋介石四百万军队，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也没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者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两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

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劳动。这并不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示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农民说，过去你们和我们一道土改，现在你们做了官了，不理我们了。过去合作社主任不参加劳动，很不得人心，群众很不高兴，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现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群众马上同他们讲真话。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比方在南方打秧锄草并不困难。当然，年老的有病的可以不去。我国有一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种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

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一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马寅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主席：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搞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唯物辩证法，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希望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三分之一，即一百五十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能接受唯物辩证法就很好了。今后学习都要自愿学习，自己研究，可以自愿结成小组。关于辩证法的课本要一年编一本，有些过时了，旧话要新讲。世界观是长期的问题。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五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要转过来为新社会服务，他们有的是旧的世界观，有新的世界观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很快的时间内就有很多人相信新世界观是不自然的，不可能的。估计十年之内，还会有三分之一多一些三分之二少一些的知识分子还会有旧的世界观，但这些人一是爱国，二是相信社会主义，这样就可以了。有些教授讲课讲马列主义，这是为了吃饭；但对自己讲，就说自己并不相信辩证法了。上海有一左翼教授说，解放以来“魂魄不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教社会科学的天天处于被动，历史要重写重教，在旧社会教书拿出来就行，一个课本可以教多少年，又没有这么多的会议。自

然科学家好一些。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早已推翻，连民族资本主义也根本没有了，个体所有制也破坏了，有人说，私有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党、政、军、教育和经济工作人员（厂长、合作社社长不在内）等共一千四百万人，合计二千六百万人。这一千四百万人不是直接生产的，真正直接参加生产的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其余所有的人都要向工人过渡的。解放时产业工人只有五百多万，苏联初期也只有三百五十万人。社会前进不决定于人数，农民有几亿，并不能解决社会的前进不前进，农民最后都要变为农业工人，合作社变为国营农场，这可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五百万知识分子的毛要附在一千二百万的工人阶级的皮上，毛脱离了皮是不行的，总要在一家吃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脚（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过去的经济基础，一经地震，他们就悬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个，说小资产阶级出二元论，资产阶级出一元论，有人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舒服些，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舒服，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社会风气。如我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的社会风气影响，受资

产阶级的教育，我信过佛教，信过康德，信过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因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工商业者政治常识课本可学，但课本就是课本，思想还是思想，总有一部分人永远不会变的。条件反射，生孩子本来不痛的，就是社会舆论说会痛就痛起来了，要变痛为不痛，要医生做许多工作，要另外一种条件反射。不要相信所有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都相信共产主义。共产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相信共产主义而且不相信社会主义，他们相信的是民主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准备。原河北省副主席薛迅就反对统购统销，主张自由贸易。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不信社会主义，他们搞社会主义是随大流卷进来的。我就不相信民主党派都信社会主义，有一大部分人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也不愿公开讲，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农民中一部分，工人中一部分（工人也成分复杂，由五百万发展到一千二百万，人心不齐），对社会主义成不成功，共产党行不行，还要看一看。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上了贼船（共产主义之船）没有办法，会不会翻船要靠天。这是很自然的。

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起算，已经百余年了。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与外国剥削者的斗争。单就最近几十年说，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三十多年，精力都耗在这上

面。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就只会搞阶级斗争，共产党有术无学，这说对了一半。说我们有术无学，要看是什么学，譬如阶级斗争是一门大学问，不能说我们没有。这是经过多少年犯错误作检讨学来的。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如同帝国主义战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办外交，都是阶级斗争性质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界科学，不懂怎么办？我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章中就说过了，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要老老实实地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党的成立到七大（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五）共花了二十四年时间，流了那么多的血，受了许多挫折才学会阶级斗争，现在学建设的新战争，要从头学起。能不能学会？肯定可以学会。有些党派专家多，如民盟、九三，民建也不少。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的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现在还在过渡时期，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巩固，打这个仗，要几十年，大概要二三十年。因为我们无经验，无干部。有苏联经验在前，可能我们比苏联略好或略差或一样。搞得怎么样，大家要看，我也要看，不能吹百分之百正确的牛皮。有人说共产党朝令夕改，特别是高教部。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会多就要变，今年基本建设就变了二十几亿。预算头年十一月就需要确定，提到人大常委，十二月就要发下去讨论，一月就要生产。提到人大是实际上的事后批准。缺少经验，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验，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属于经济方面的。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

(1957年7月1日)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

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

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哪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

(1957年7月7日)

中央，并请转罗瑞卿、王任重^[1]二同志：

我拟七月廿四日到重庆，廿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2]。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3]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七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毛泽东

七月七日

[1] 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57年7月7日给毛泽东复电说，关于在三峡游泳一事，常委提出先派人调查和试水，然后再作决定。后来，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

[3] 孙勇，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副科长。韩队长，指韩庆余，当时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

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

(1957年7月9日)

—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有两事通知如下：（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2]，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20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这个通知给中央的便信。

[2] 在这个通知之前，中共中央在1957年6月29日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

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 16 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中央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二

中央：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1]一商，如认为可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泽东

七月九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 三十六周年的电报^[1]

(1957年7月9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阿尔维齐德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時候，我們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熱烈的祝賀。

中國人民高興地看到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黨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且對鞏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和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事業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祝蒙古人民勝利地完成和超額完成1957年的國民經濟和文化建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阿尔维齐德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的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设计划。

祝中蒙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于北京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

(1957年7月9日)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九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

[1] 参见《列子·天瑞》。

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没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和科教文化艺术工商界人士座谈。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像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

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

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

“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哪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分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分。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

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和科教文化艺术工商界人士座谈。

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

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像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哪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

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像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像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

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像。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自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

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做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哪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

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多么尖锐，多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子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

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哪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不花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¹¹¹，

[1] 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

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

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

关系，就像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7月18日)

—

现在是过第三关，过第三关顶少还要十年。历史上包下来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只是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估计到他们有一部分人随时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把孙行者的尾巴打下去，花果山的猴子就不神气了。抓住改造，逐步把领导权转到左派和中间派手里。各省市基层把民主党派、教育界的领导权拿过来。学校实行党委制可以考虑，但我们必须领导学校，领导权过去是不巩固的，有一部分领导权是在人家手里，缺乏战斗力，一时搞得天昏地暗，例如清华大学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但党的领导并不巩固。科学技术界、新闻、艺术、出版、教育、卫生界，都有左中右，我们不占领阵地，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总之，要搞意识形态，要搞知识分子。过去搞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没有好好搞教育界。过去省委书记怕见大学教授，现在见了一下，见出名堂来了。再摸一个时

期，就更清楚了。

敌我双方对政治形势的估计都不大对头。敌人方面对形势估计错了，我们对自己的估计也不是那么正确，在鸣放期间，觉得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对工农兵——我们的基础估计不足。现在看来，在工农党团员中只有少数，大部分是好的，我们也为假象所迷惑。

多次人民代表大会，政协都要斗一场。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大体上顺着我们，实际上是反对派，拥护是假的。到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提出的“两百”方针，加上匈牙利事件，他们开始翘尾巴了。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陈口口等几个同志。说百花齐放可以，但放得不妙，放出牛鬼蛇神了。周恩来二月回来以后，罗隆基公开批评总理的外交报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还有几个学校闹事，工厂闹事，农村闹事，以为形势不妙了，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就是大学也是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不好。反右只有一个多月，就看出来了。民主党派打他百分之二十，也还有百分之八十，经过六月，七月半个月，我们就完全清楚了。凡事皆要加以分析。分析了就有底了。这一下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

敌人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工农估计不足，对左派也估计不足，这一点右派同我们一样。在中国搞匈牙利是搞不起来的。放，还应当有决心，不然就放不起来。

还有，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在打的当中，建立领导权。抓住这个时期搞他一年。如果搞到明年六月，全国人大改选，我们假如再提他们的名，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地方，明年初就要开始政治改组，三月各省把改选搞完。我们这样估计：打算打一年。现在报纸上这样积

极地吹，总吹也不行，还要搞点别的。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其他的人，哪怕也有些错误□他是领头□□，□□□，□□□怎么打法？□□□反人民，不公开反共不闹事，但死也不改。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不可小看，对右派分子要剥笋。

知识分子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工农事业不那么有感情。但他们有这样种种倾向，只要他们今天倾一点，明天倾一点，再过十天工夫就改造了。山东提议：要反右派的事情向工人农民作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好像都在替工人、农民说话。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祥）。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

合作化没有希望？有这样一些富裕中农，本想叫他们慢慢进社，也挡不住，进来了又想退出去。是否让他们退出去？从阶级路线来看，少数不愿在社的，可以让其退出。山东临沂地区一百多万户，退了一万户，过去闹事最多，现在是全省比较太平的地方了。退出去的不要苦他，也不扣右派帽子，将来愿意来的就来，要退的大体上有百分之一，愿意退的就允许退。今年秋天下这个决心看如何。

农村、工厂整风如何整法，要把解决的问题收集一下，准备意见。中央拟于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开一次中央全会，地委书记也参加，研究整风与体制问题。党代表大会可在一、二月底到春节前召开。

整风问题，头一步以政治为主，结合思想（敌对阶级的、内部的）；下一步以思想为主，结合政治。这里讲的政治，主要指反右派斗争。其实，同敌对阶级的斗争，多数人向我们提的意见，如傅

鹰，和我们不是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政治关系。如权限下放，也是政治关系。但像张轸那样的家伙，写信批评周、□，就要狠狠批评，要登报。这些人要告诉他好好重新做人，留一碗饭吃。民主人士的职务要重新安排，代表、委员、部长、厅长、局长，在这次运动中有功劳的要上台，右派要下台。他们由长期共存，变为短期共存，由互相监督，变为无权监督，自己否定自己。

有职无权，人事制度，评级评薪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调整关系的问题。

每天都有高潮低潮，上报的人数要增加，并且要各行各业都反映到报上去，这样就不单调。下一步整风，思想要搞得深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要费点时间，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

今后反右派斗争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一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徐州地委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层干部是好的。另外百分之五十分三类：轻微错误的有百分之二十，比较严重错误、手头不干净的有百分之二十九，严重违法乱纪的只有百分之一。前两类可以主动下楼。办法是开开干部会，肯定成绩，检查错误。

什么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总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倾听群众意见，加以分析。好像游水一样，要顺水性，或者说是鱼水关系。干部脱离群众，就不能活。过去军队在战争中都是搞三大民主，为什么现在工厂、农村里搞三大民主呢？军队是拿着枪的，都不损害干部威信，为什么县、区、乡干部不能这样做呢？对干部一个是撑腰，一个是帮助。毛病要改，又不要伤害干部。大家批评一下，一篇检讨就可以过关，要教会基层干部过关。农村、工厂不能采取机关、学校的办法。而采取三级干部会、

社员代表会、支部大会、职工代表会等，就是陈伯达同志的办法。陈伯达在福建的办法，开始区、乡干部都不赞成，后来大部分的干部选上了，选举不要党团员保证，而是充分酝酿，群众提名。各省可搞点经验。

工厂干部要下车间，还要到宿舍。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讲道理的关系，不是我打你通，我压你服。共产党不怕群众。实行民主的结果是增加威信，而不是降低威信。过去军队实行民主，就打胜仗。

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少杀不是不杀，杀少数人是完全必要的。浙江仙居、临海两县，合作社解散百分之八十。每年准备一百万人闹事，或者还要准备多一点。

河南长葛县修飞机场赶走农民，打伤四个人，这是国民党作风残余。有些国民党作风残余的是合乎实际的，一定要整好，虽然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彻底整好。这次整风，要想一次整好，一劳永逸，我才不信。现在要把闹事的数目扩大一点，六亿人民每年准备有三百万闹事，百分之零点五的人闹事，经过几年右派一闹，我们摸了底，就不怕了。过渡时期有个不稳定的时间，再有五年半能把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下来，就是好的。总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陈伯达讲的不是狭隘经验。

二

北京打击了一千五，全国要打出十个北京来。大树是有根的。

大地主的儿子。这是新式肃反，要好好交代地委书记、县委书

记的斗争策略。

大字报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怕大字报？因为我们总是多数。

工厂一定不要妨碍生产，哪个地方烂，崩溃越多，哪个地方就越好办事。省要派有经验的干部下去，硬着头皮，大放大鸣两个星期，只听不说。

每个五年计划搞两次整风，一大一小。

不要搬石头，现在我们还靠这些石头。粮食年年增产，但是越来越少。去年动用库存七十亿斤，今年一定要搞八百五十亿斤。穿也是大事，现在折半了，越搞越少。怎么得了？

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己诏”千万不下。

手工业社脱产人员太多，浙江兴登县七万人有三千五百多官，真是太多了，应该减三千，留五百。工厂非生产人员也太多，占百分之三十。苏联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只百分之三至五，现在要考虑。多的人要养起来，几年内转到生产中去。用节约下来的钱扩大经济事业。

整风范围扩大，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艺术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

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共产主义者协会要大于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去当会长。

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除。地、富、反革命的选举权，不要给得太早了。不搞大，只搞小，这些关口要卡住。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反右倾思想，右派，极右派，合乎人情，顺乎天理。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 国庆的电报^[1]

(1957年7月20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欣喜的心情注视着兄弟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维护和发展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保卫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中、波两国总理的互相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促进了中、波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祝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保障欧洲和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的电报。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世界和平事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

(1957年7月)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

[1] 这是毛泽东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8月和9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

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

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

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共产党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屡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

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

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1] 参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五节。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

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1957年7月21日，毛泽东等在青岛第二浴场。



1957年8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青岛第一体育场与青岛市级机关部分干部和驻青部队团以上干部合影。

中央关于召开中共 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1]

(1957年7月31日、8月1日)

—

刘、邓^[2]:

此件请提政治局通过，发出。省属市委提名是否恰当，请酌。

毛
七月卅一日

—

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各地委；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旅大、济南、青岛、南京、杭州、广州、长沙、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太原各省属市委：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决定于今年九月下半月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请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上开省属市委选派代表一人参加，最好是第一书记。省级第一书记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者，不再选派代表。议程主要为：（一）整风问题；（二）农村问题。特此通知，请各有资格到会的同志们在会前对这两项问题加以研究为盼。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 反右斗争的指示^[1]

(1957年8月1日)

各省市党委、自治区党委：

(一) 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二) 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三) 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给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指示。

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对范仲淹^[1]两首词的评注

(1957年8月1日)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

[1]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吴县市）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1]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1] 李讷，1940年生，毛泽东之女。

给林克^[1]的信

(1957年8月4日)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2]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八月四日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做什么？》，今译为《怎么办？》。《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1917年4月7日发表于苏联《真理报》。

给刘松林^[1]的信

(1957年8月4日)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

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八月四日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5年刘松林去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数力系读书。1957年暑假回国办理转学手续。同年10月转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

给刘松林的信

(1957年8月9日)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八月九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 十二周年的电报^[1]

(1957年8月13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同志：

当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時候，我們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你們，并通過你們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朝鮮人民致衷心的熱烈的祝賀。

朝鮮人民在朝鮮劳动党和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战后三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而感到欢欣。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维护朝鮮停战协定和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不仅为全体朝鮮人民所拥护，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的电报。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

而且获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祝朝鲜人民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于北京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1957年8月15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欣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二周年，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致热诚的祝贺。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深厚友谊，通过阁下去年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已经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增强，祝阁下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昌盛和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

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1]

(1957年8月18日)

—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份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另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成为左派。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而在从资本主义立

[1] 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前进了第一步；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不过多数人口里不说罢了。但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

二

鉴定工商界的右派分子，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当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结合去年高潮以后的言行，除了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许多极右分子以外，不要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因为工商界在实行企业合营以前，是立足于合法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是自然的和合法的，而在高潮到来以后，由于实行了全行业合营，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确已跨进了一大步，再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便不得人心和不利于争取多数。这一段时间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7年8月18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2]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关于同意发表《克服教条主义， 投入反右派斗争》^[1]一文的批语

(1957年8月19日)

退人民日报吴冷西^[2]同志。看过，可用。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1] 指《人民日报》送审的陈其通、陈亚丁写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的清样稿。1957年8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同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作了自我批评。当时马寒冰已经去世，鲁勒正在国外。

[2] 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庆的电报^[1]

(1957年8月21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格·毛雷尔同志：

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欢欣的心情注视着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罗两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斯托伊卡、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格·毛雷尔的电报。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祝贺马来亚独立的电报

(1957年8月30日)

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陛下：

欣闻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谨向陛下和马来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马来亚联合邦繁荣和马来亚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1957年8月3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当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年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1]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越南人民所拥护，而且获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

[1] 指1954年7月20日到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各国和平的各项协议，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以及《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这些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恢复和平，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尊重这三个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最近胡志明主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访问，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发展同邻邦和其他亚洲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所获得的新的成果，必将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祝越南人民在为祖国的独立、和平和统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越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57年9月)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毛泽东

[1] 指中共中央1957年8月26日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第四次修改的草稿）。指示说：正确执行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曾是我国顺利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今后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保证。实现合作化以后，互利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经过合理的生产分工和合理的分配，恰当地调节各社员之间，尤其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收入问题。指示就认真贯彻执行互利政策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对于可能减少收入的社员，首先是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应该在劳动生产分工和经营社内及家庭副业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二、适当地调整入社后减少收入的非农业户的工作，使能得到合理报酬，增加收入。三、对某些特殊生产资料的原主，可以部分或全部暂不入社，仍归原主经营，也可以入社后仍包给原主经营，实行比例分益，在包工包产上给予适当照顾，使他们能增加一部分收入。四、成片的果树、林木一般应该由社统一经营，实行比例分红，已折价入社的，如社员意见很多，也可改为比例分红。五、对于入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多余的折价款和社员的投资，应按期归还，并付给应得的利益，折价过低者，则按入社时的一般市价作适当的调整。六、多民族地区的民族联合社，要注意特别照顾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社员的经济利益。七、应允许社员家庭饲养家畜，并完全归自己所有，合作社如要使用社员的耕畜，应付适当租金。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在国棉四厂看大字报。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国棉四厂步入码头，准备再一次畅游长江。



1957年9月，毛泽东步行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前看大桥画册。



1957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和群众交谈。



1957年9月，毛泽东在武昌造船厂码头乘船，于长江大桥5号桥墩下水游泳。



毛泽东游泳后准备上船。



1957年9月10日，毛泽东看密云水库工地小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国庆的电报^[1]

(1957年9月8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卢卡诺夫同志：

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的時候，我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你們，並且通過你們，向兄弟的保加利亞政府和保加利亞人民致以衷心的、熱烈的祝賀。

中國人民以十分歡欣的心情關注着保加利亞人民在保加利亞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在同偉大的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親密的合作下，在建設自己祖國的社會主義和維護歐洲和世界和平的事業中所取得的成就。

一年以來，中保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已經有了廣泛的發展。我們相信，這種友好合作的發展將一定加強以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卢卡诺夫的电报。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且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祝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 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9月12日)

—

退胡乔木^[2]同志。此件可用。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

—

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时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195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1957年，毛泽东在聂荣臻、贺龙、罗荣桓等陪同下观看空军飞机表演。

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9月15日)

—

退胡乔木^[2]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一^[3]再加斟酌。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二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为查找《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写的批语^[1]

(1957年9月15日)

林克^[2]:

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四期。

毛
十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1957年9月15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旁边。这篇摘要摘自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原载《哲学研究》1957年第四期。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给陈云^[1]的信

(1957年9月16日)

陈云同志：

八月廿八日的信收到。你父亲^[2]入党时间及其工作情况，我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期我不在湖南。你们努力工作，帮助你母亲^[3]治病，甚慰。请代问你母亲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1] 陈云，当时在湖南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员。

[2] 指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1929年年底，受中央军委派遣去湘鄂西协助贺龙工作，途中被捕，1930年2月被杀害。

[3] 指陈昌的夫人毛秉琴，早年同毛泽东熟识。

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

(1957年9月17日)

要青年学生打杂扫地，也不是一件坏事啊！我看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不再轻视劳动，要愿意参加体力劳动，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宴会上的讲话

(1957年9月19日)

副总统阁下，

同志们、朋友们：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印度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拉达克里希南博士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感谢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伟大的印度人民的深厚友谊。

中印两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使我们的传统友谊有了新的基础，新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都在建设自己的国家，都在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为了这些共同的目标，我们两国进行着亲密的和友好的合作，中印两国十万万人民团结在一起，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是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扭转这个形势。但是，正像去年埃及人民和现在叙利亚人民向全世界所表明的那样，殖民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和挑衅一定会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人民历来对勤劳、智慧的印度人民怀着极大的敬意。我们

庆贺印度人民在和平建设中的每一个成就。我们敬佩印度人民对于国际和平事业的出色贡献。我们特别感谢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的正义支持。我们毫不怀疑，印度将在世界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提议，

为印度共和国的繁荣和印度人民的幸福，
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世界和平，
为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阁下的健康，
为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沙德阁下的健康，
干杯！

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 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9月20日)

—

即送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

毛泽东
九月廿日上午一时

—

我们应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准备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时加写的一句话。这篇报告1957年10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关于转载上海工商界 批评高方的报道^[1]的批语

(1957年9月25日)

乔木、冷西^[2]同志：

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以后请鼓励这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现在的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提倡浮夸，很不切实。右派浮夸，左派不应当浮夸。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1] 指1957年9月22日《新民报》晚刊刊登的《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的报道。1957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作了转载，题为《这次辩论进行得好——介绍上海工商界对右派分子高方的说理斗争》。高方，当时任上海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关于印发《全会各小组 活动情况》^[1]的批语

(1957年9月30日)

小平^[2]同志：

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毛泽东
九月卅日

[1] 这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一种简报。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七绝·观潮^[1]

(1957年9月)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2]。
人山纷贊阵容阔，
铁马^[3]从容杀敌回。

[1] 观潮，指观赏浙江省钱塘江口的涌潮。钱塘潮以每年阴历八月十八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毛泽东在1957年9月11日（即阴历八月十八），曾乘车去海宁七星庙观潮。

[2] 钓鱼台，即钓台，在钱塘江中段的富春江边，相传为东汉严光（子陵）隐居垂钓处。

[3] 铁马，配有铁甲的战马，借喻雄师劲旅。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钱塘江涌潮袭来时，波涛汹涌，如闻“十万军声”。

国庆之夜会见各国贵宾时的谈话^[1]

(1957年10月1日)

毛主席同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托菲克·雅兹谈话时，祝叙利亚独立、繁荣和强大，祝叙利亚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人们高兴地看到叙利亚、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团结，所有阿拉伯人民都要团结起来。”毛主席还请托菲克·雅兹转达他对叙利亚总统、总理和一切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问候。

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对中国人民对叙利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还转达了叙利亚总统对毛主席的问候。他说，希望叙利亚总统能有一天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说，很可能。

在同埃及客人们会见的时候，毛主席请客人们转达他对纳赛尔总统的问候，并祝埃及人民好。

毛主席同美国青年谈了话。他说，希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能够在和平中友好往来。

[1] 这是新华社发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会见各国贵宾》的新闻报道中的一段。



195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庆祝国庆节的群众游行队伍。



1957年10月1日晚，毛泽东、朱德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卡达尔在天安门城楼上观赏国庆焰火。

给林克^[1]的信

(1957年10月2日)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漠〈寞〉吧？

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2]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二日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六朝文絜》，是清代许梿选编的一本骈体文集。该书选录晋至隋的骈文72篇，大多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美的抒情写景名作。

林克：

今日子见，~~但~~有些宋词篇？
请到图书馆中去，广收
十本给我，我都有。因为最近一忙
忙，~~忙~~论文章，逐步堵塞了这一方面的自由，
饭，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
是不善运动时候了，但人不损害健康
为~~健康~~。请你找一部《朝吟集》及
其他诗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十月二日

毛泽东致林克信的手稿。

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1]

(1957年10月3日)

一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基础，工业不发达，国防因而不巩固。我们是依靠政治的。过去是靠政治战胜敌人的，那时敌人很强大。现在敌人更强大，因为我们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

二

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但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赞成你^[2]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阵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人多，但在帝国主义面前是弱国。他们有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波兰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指波兰国防部部长、波兰访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斯彼哈尔斯基上将。

氢弹，他们侵略我们，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战。他们想消灭我们，也想消灭波兰和苏联。

三

事情是不容易的，在我们这些国家里，革命尚未最后胜利，还要相当长时期才能解决。今后的事，就由我们自己负责了。究竟如何？方针政策是否对？十年十五年以后才能证明。以后的人来算我们的账，也许我们还活着，自己来算这笔账。所以要谨慎小心，随时总结经验。我们欢迎你们来中国看看，对情况可以分析。对中国的缺点、错误要足够地估计到，同时也足够地估计其正确的方面、有利方面。我们也研究你们的经验。但我们的经验较之苏联不完全得多，它有四十年，我们要好好研究。丢开个别的不愉快，心平气和就好办事，同苏联同志也好相处。在我们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尚未解决，在国际范围内更是如此。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不仅能打游击，而且可以进行正规战了，也许那时候帝国主义就很难打了。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立八周年的电报^[1]

(1957年10月6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奈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之际，我们谨向你们和全体德国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深切地关怀着德国人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为建立统一、和平和民主的德国，为完成国内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艰巨的斗争，并且为德国人民所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年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奈斯·狄克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电报。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

来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相信：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德两国人民，而且必将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有力的贡献。

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月六日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7年10月9日)

这次会议的评价：

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

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

大胆的改，彻底的改，坚决的改。

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部〈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

四十条^[1]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十年了，要完成“四、五、八”^[2]。

六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

[1]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这个纲要（草案）先后在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10月16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0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纲要（修正草案）。

[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四、五、八”是上述粮食平均亩产指标的简称。

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四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验^[1]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五年突击，三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四无国。

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2]，值得一阅。

[1] 指中共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铭勋在《一个搞好卫生工人财两旺的农业社》的发言中介绍的广东省乐昌县岐乐农林生产合作社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爱国增产卫生运动的经验。

[2]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7年5月4日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上海局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1957年10月9日将这个报告印发给参加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印在报告的封面上：“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值得一阅。毛泽东 1957年10月9日。”第二个批语印在报告第一页的标题下：“此件是我在华东五省一市1957年4月杭州会议上在听了浙江省委的口头报告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请他们写成书面〔报告〕给我。他们就在1957年5月4日写成寄来了。毛泽东 1957年10月9日”。

红安县的经验^[1]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十年计划，十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八年，十八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十年，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

[1] 指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1957年9月写的《合作化改变了老苏区的面貌，红安县1957年获得了社社增产，样样丰收》的报告所介绍的经验。报告说，为了切实领导好农业生产，红安县委干部深入农业社和生产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同时亲手试办高额丰产的试验田，进行典型示范，使领导干部开始懂得农业生产知识，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克服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改变了过去空谈政治的领导作风；农业技术干部通过试验，也开始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和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更好地推广了农业技术；农民从高额丰产的实验中，也提高了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克服了保守思想，积极改进了对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总之，通过办试验田，使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和农业社的管理三个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

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一次三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1]

军队军〈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十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肖楚女、齐白石、高尔基〈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2]为例。

[1] 指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1957年10月8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发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精简、整风、政法等问题的发言和中共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铭勋作的《一个搞好卫生工人财两旺的农业社》的发言。

[2] 肖楚女，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齐白石，中国现代画家、篆刻家，建国后曾任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高尔基，苏联著名作家。玄奘，唐朝高僧，与南北朝时的鸠摩罗什、真谛合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创始人之一。惠能，唐朝高僧，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梁鸿，东汉文学家、诗人。富兰克林，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

做革命的促进派^[1]

(1957年10月9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1]，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

[1] 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

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像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

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

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在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

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

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

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

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

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1]。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

[1] 参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出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也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

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哪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

对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 争取丰收的报告的批语

(1957年10月9日)

—

此件^[1]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底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查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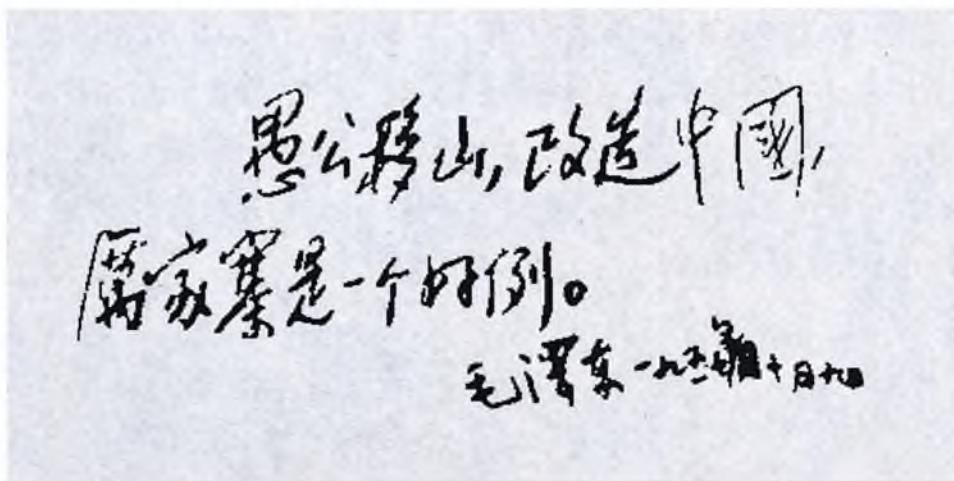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1] 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1957年4月29日关于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发表于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题为《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记大山农业社建设山区的丰功伟绩》。

二

此两件^[1]立即付印。本日下〔午〕三时三中全会开会时发给每人一份。请尚昆^[2]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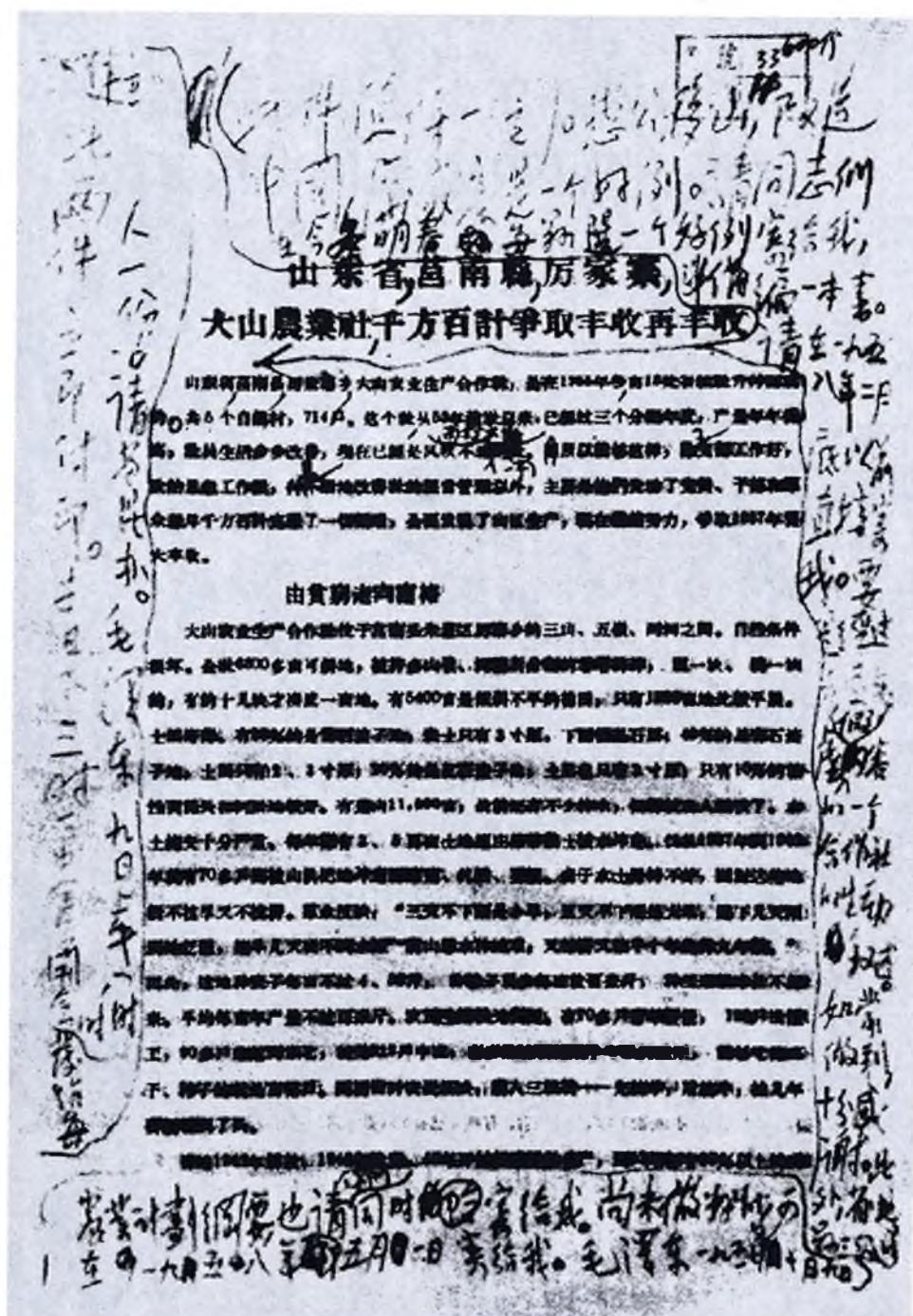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九日上午八时



毛泽东为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的题词。

[1] 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的报告和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批语。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关于厉家寨事迹的手稿。

祝贺威廉·皮克连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1957年10月9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在你连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时候，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总统同志，你的任期的延长，再一次证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对你的无限的信任和真挚的爱戴。

祝你为在和平民主原则上统一德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对探讨辩证逻辑对象问题的 一篇文章^[1]的批语

(1957年10月11日)

送陈伯达^[2]同志。这里辩证逻辑一文可以一阅。此人有些新颖见解。阅后还我。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1] 指195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且大有《对于探讨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认为，近几年来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迄至目前为止，仍然束缚于恩格斯的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相互关系的比喻，没有多大的进展。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本身的问题没有弄明白，就来谈二者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受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文章就讨论中涉及的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谈了个人的意见：一、辩证逻辑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看作辩证逻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把关于思维的一般学说和辩证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与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等）的学说等同起来，实质上否认辩证逻辑这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二、辩证逻辑不是与辩证唯

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并列的哲学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科学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一般的客观辩证法，研究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个领域，是研究其中一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研究的是主观辩证法，是研究思维领域中特殊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二）认识范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适用于人类认识的全部领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历程；而辩证逻辑仅适用于理性认识的范围。（三）阶级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阶级性的；辩证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是探讨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之一，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三、辩证逻辑是而且也只能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具体科学。它是研究思维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和形式的辩证思维。四、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还应研究思维规律，还要探讨一些逻辑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方法；至于证明、假设和类推的问题，也有以辩证逻辑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必要。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10月12日)

—

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2]同志看一遍，印若干份发给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人，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一次，争取于十月廿日在报上公布。政治局是否还要讨论一次，请刘邓决定。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7年9月6日印发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此稿序言部分的修改，后来公开发表时，这一段话改为中共中央对纲要（修正草案）的一个注；本篇三至八是毛泽东分别对此稿的第一、第七、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八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有所修改，是否妥当。

阅后退田家英^[1]办。

二

这个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

三

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者，听其自便。

四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

五

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

六

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七

除疾病的根本精神，跟除四害是一样的。

八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

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

(1957年10月13日)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

[1] 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

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来一个洪峰？像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哪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那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

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哪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

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

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像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哪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第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做“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不出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

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

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

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

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

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

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浑，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

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我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总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者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

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1957年10月，毛泽东会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

致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电

(1957年10月17日)

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舒克利·库阿特利先生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时，承蒙来电祝贺，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衷心的谢意。

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

祝中叙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发展，祝叙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祝叙利亚共和国繁荣和阁下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于北京

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命令

(1957年10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1]

(1957年10月26日)

各级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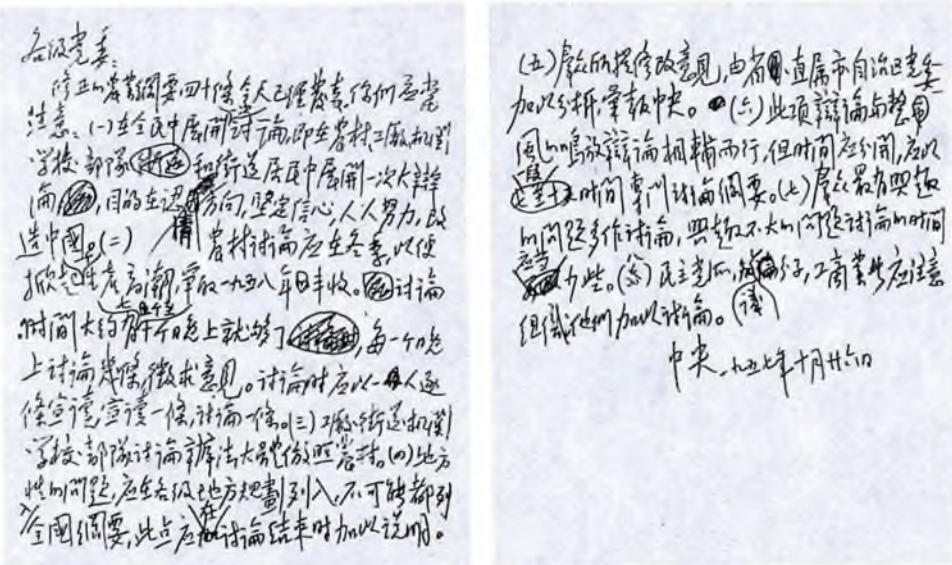
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你们应当注意：（一）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二）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丰收。讨论时间大约有七个至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讨论时应以一人逐条宣读，宣读一条，讨论一条。（三）工厂、街道、机关、学校、部队讨论办法大体仿照农村。（四）地方性的问题，应在各级地方规划列入，不可能都列入全国纲要，此点应在讨论结束时加以说明。（五）群众所提修改意见，由省、直属市、自治区党委加以分析，汇报中央。（六）此项辩论与整风的鸣放辩论相辅而行，但时间应分开，应以一段时间专门讨论纲要。（七）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多作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应当少些。（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应注意组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织他们加以讨论。

中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廿六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的手稿。



1957年10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图为通车典礼上，数百辆汽车驶过长江大桥。

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1]

(1957年11月2日)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布尔加宁^[2]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中國代表團
全体同志受中國人民的委托，來到莫斯科向我們的蘇聯兄弟們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我在1949年底、1950年初訪問過蘇聯。那時，我們兩國政府簽
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從此開始了我們兩個伟大社会主义國
家的亲密結合。

以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和伏羅希洛夫同志先後訪問
中國的時候，他們都邀請我再一次訪問你們這個伟大的國家。最
近，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邀請中國政府和中國共
產黨派出代表團參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慶祝。對於

[1] 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
活动，于1957年11月2日抵达莫斯科机场时的讲话。在讲话稿上，毛泽东
写了以下批语：“（一）印发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二）即刻翻成俄文
和英文；（三）送宋庆龄、郭沫若、茅盾各一份，请提意见，阅后收回。”宋
庆龄、郭沫若、茅盾（即沈雁冰）为中国代表团成员。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伏罗希洛夫，
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所有这些友好的邀请，我和我的同志们都表示非常的感谢。

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把侵略和战争的矛头指向阿拉伯民族，指向独立的叙利亚。这种侵略企图有导向世界战争的危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对侵略者的严重警告。全世界人民都应当警觉起来，为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同志们，我们将永远站在一起，为着世界和平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光荣归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光荣归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后，接受演员赠送纪念章。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图为毛泽东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检阅苏军仪仗队。



1957年11月，毛泽东、宋庆龄到克里姆林宫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1957年11月，毛泽东等在苏联访问。



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的毛泽东。



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的毛泽东。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前往拜谒列宁陵墓。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陵墓，并敬献花圈。



《继往开来》(中国画)

关于公布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的命令

(1957年11月6日)

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第八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 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1957年11月6日)

亲爱的同志们：

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节日，我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全体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谨向在座的各位同志和朋友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中经历了艰苦的路程。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敌人曾经显得好

像比苏联更强大，他们两次武装进攻苏联。但是英勇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把这些侵略者的进攻彻底地粉碎了。

苏联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是一个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国家，是一个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真正反对民族压迫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本国全体人民的热烈支持，同时有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两种支持所达到的程度，是各国的历史所从来没有过的。

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所有这些，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骄傲。对此感到不高兴的，只是一些反动派。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的工

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1]。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

[1] 参见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的译文是：“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页）

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同样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拒绝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损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现在全世界踏上十月革命道路而赢得胜利的，已经有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包括了九亿多人口，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早已丧失了优势，社会主义早已变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帝国主义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国内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以外，还指望着战争。但是他们能够从战争中指望什么呢？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

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地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苏联在裁军问题上，在禁止制造、使用和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上，所一再提出的建议，代表着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主张，同时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美帝国主义顽固地要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在中国干涉解放台湾，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叛乱^[1]。它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现在还在策划通过土耳其或以色列侵入独立的叙利亚，还在阴谋颠覆反殖民主义的埃及政府。美国的这种疯狂的侵略政策，不但造成了中东的危机，而且造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危机。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都站在叙利亚方面，反对美国和土耳其的侵略者，正如他们在去年十月都站在埃及方面，反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者一样。苏联政府已经向美国和土耳其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迅速打消侵略计划。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的卫国斗争，坚决支持苏联的正义立场。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应该记住，由他们任意摆布人类命运、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帝国主义曾经而且还在继续竭力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它终究无法阻止中国的六亿人口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1] 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路。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已经在八年的短时期内取得了过去百年中所不可能有的成就。中国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中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亲密的联盟。他们的这种狂妄企图，已经在全国人民的反击之下彻底失败了。^[1]

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须解决的各项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长，错误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结迅速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我们正在六亿人口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这个人民自我教育运动，大概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今后，我们准备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运动时间可以大为缩短，作为解决我国整个过渡时期各项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有一个

[1]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必须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我们方面的，是讲道理的。这一点已为运动的全部经验所证明。

我们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整风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说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苏联的多方面的兄弟般的援助。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请让我们对于给予中国这种友好援助的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以衷心的谢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条约^[1]。这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采用一切挑拨离间的手段，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和团结。但是，事实只能使帝国主义者失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得愈来愈紧密了。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

[1]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主要内容是，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同盟国家的侵略行为；双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互助合作关系。条约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1979年4月3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

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这样说过：“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该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个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1]九十几年前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永远不会过时。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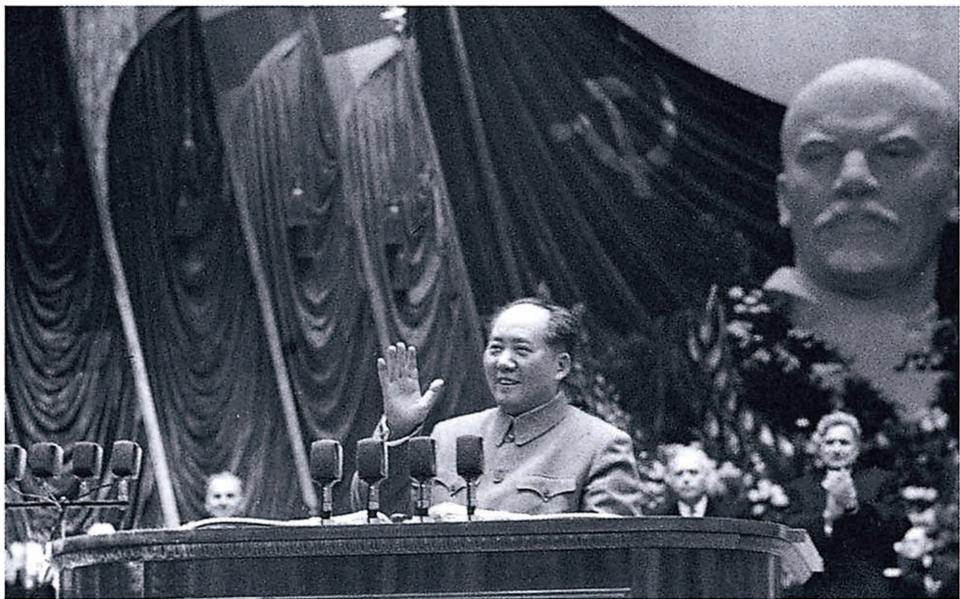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1] 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新的译文是：“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图为会场全景，讲话者为毛泽东。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

(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

—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1957年11月14日和16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本篇三是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去年这一年，帝国主义搞了一个风潮，在我们脸上擦了一点黑。今年好了，天上没有乌云了。而西方世界的天上有相当多的乌云。我们的事情更好办了，杜勒斯却比较难于睡觉。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

个五百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五百公斤。搞一个五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五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你干不干呀？（赫鲁晓夫同志插话：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可能。）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对，主要由你努力。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了。罗斯福不是讲过“免于恐怖”吗？资产阶级政治家有时候也讲几句好话。不过他们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要免于恐怖，要有五万公斤，或者还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

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譬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我提出这个意见，同志们要批评尽可以批评。各国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你们不赞成请你们批评我。

二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方法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譬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

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機會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義。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機會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寧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怎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什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機會主义的性质也没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寧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

三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

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1]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2]，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3]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

[1] 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2年夏，德军在对苏联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7月17日德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企图攻占该城，切断伏尔加河，南夺高加索油田，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5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大量敌人。11月19日苏军转入反攻，23日包围了33万德军。次年2月2日全歼该敌。这一战役，德军损失兵力达150万人，苏军夺得战略主动权，标志着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新的转折点。

[2] 匈牙利事件，指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3] 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69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10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1]，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两个卫星上天^[2]，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3]和丘吉尔^[4]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

[1] 法斯特，1914年生，美国作家。1942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写过一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反映美国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作品，担任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

[2] 指1957年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成功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3] 罗斯福，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

[4] 丘吉尔，1940年至1945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

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1]，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2]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在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3]，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4]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

[1] 雅尔塔，在前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 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地区。

[4] 杜鲁门（1884—1972），美国民主党人。1945年至1953年任美国总统。

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1]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会址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2]。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3]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

[1] 金日成（1912—1994），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战争期间，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2]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组织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连同美国共16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

[3] 胡志明（1890—1969），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1]，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做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2]。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的，它也会抛

[1]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中，规定法国军队集结在北纬17度线以南。这样，就把大半个越南划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2] 先锋计划，是当时美国制订的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计划。美国试图通过这一计划在航天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

卫星的。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1]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

[1] 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高兰（1911—1977），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1]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2]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

[1]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2] 二月革命，指1917年3月（俄历2月）在俄国发生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过是纸老虎（PAPER TIGER），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

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1]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比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2]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3]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1] 哥穆尔卡（1905—1982），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指1957年11月16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

[3]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越南、蒙古、朝鲜和中国等12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1]。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已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原文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1]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

[1]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也许你们讨厌我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讲这样一类问题。我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时间又讲得很长了，那就不讲了吧。但是，我还要讲几句。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了，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做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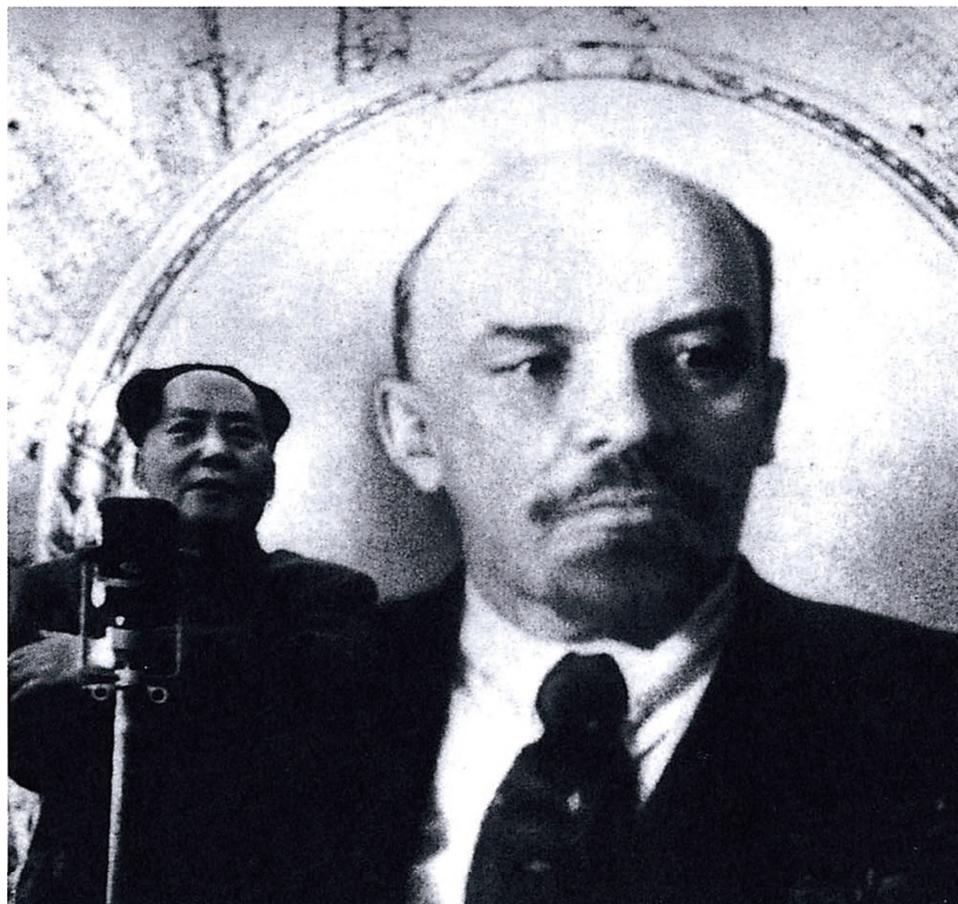
1957年11月，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自右至左：乌兰夫、宋庆龄、毛泽东、邓小平、郭沫若。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及《和平宣言》上签字。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上签字。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15年内中国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公布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的命令

(1957年11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八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 迂回道路逐步上升^[1]

(1957年11月16日)

—

人们往往估计不足。我就犯过这样的毛病，有时估计过高，有时估计不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一直等到恩格斯逝世后二十二年才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也是估计不足，他认为就要发生世界革命，但匈牙利的革命、德国的革命都垮了台，波兰的革命也没有取得胜利。后来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托洛茨基^[2]派对此没有信心，他们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而斯大林及和他在一起的同志们则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于是全党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结果，全党承认在一国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样才有了信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要革命就要好多国家同时进行，并且还要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首先

[1] 本文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托洛茨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取得胜利。事实的结果并不是如此。西方的文明国家到现在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首先胜利的却是经济落后的俄国，更落后的中国也取得了胜利。

中印两个国家有两点特点：一是穷得很，二是不识字的人多。对这两点也要加以分析，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不好的，落后、贫困当然不好。西方国家对我们很傲慢，看不起我们，说我们生活水平低，贫困、愚笨。我们承认这些，他们说得对。我们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能比得上西方国家工人、农民的生活及文化水平吗？他们也说亚非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好，因为亚非国家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和财富赶不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从这一方面来说是不好的，即所谓落后国家，不发达的国家。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一方面西方国家是看不到的，就是穷的人、不识字的人要革命。谁把英帝国主义从印度赶走呢？是印度人民。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呢？是中国人民。

蒋介石等四大家族^[1]集中了中国最大的财富，文化水平也高（当然只有唯心论的一套）。蒋介石手中掌握了武装力量，有四百万军队，还有一点空军和坦克。在一九四六年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只有九十万军队，连一点空军、一点坦克都没有。他们后面还有一个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帮助，而我们毫无帮助。那时我们只有被分割、被包围的十几个根据地，人口只有九千万，而他们却有四亿多的人口。我们没有大城市，只有像延安那样的小城市。延安只有七千人。我们同他们打了三年。开头一年，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延安，还占领了我们大部分县城。我们有计划地撤退，使他们的军

[1] 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统治集团。

队分得很散，分散在四面八方。一年后，我们开始反攻。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几个指头去吃掉他们的一个指头。我们撤退的时候，军队没有损失。当我们反攻时，集中几个指头吃他们一个指头，一个指头被我们吃掉了，蒋介石发现他只剩下九个指头了。我们按照同样的战略方针又吃掉他们一个指头，他们只剩下八个指头了。于是照样再吃一个，又吃一个。最后，他们只剩下四个指头了。但是，那时他们还很厉害，战斗力很强。一九四八年冬和一九四九年春，在三大战役中，他们大多数指头被吃掉了，只剩一个指头了。他们说要讲和，好像共产党是好战的。共产党也爱和平，让他们派代表来北平进行谈判。谈了一两个月，达成了协议，他们代表团里十几个人都赞成协议。至于签字，他们便要向南京请示。协议的条款规定战犯要捉起来，第一名战犯便是蒋介石，他们的军队要改编，政权要交出来。蒋介石一想不能签字，那时他又不爱和平了。在他拒绝签字的那天晚上，我们的军队便渡过长江。那时中国人民讲，不是共产党不要和平，而是蒋介石不爱好和平。

至于现在的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好不好？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我们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但是我们天天在广播：和吧，我们都是中国人，过去又是朋友，你们被美国欺侮也不好。结果他们不来。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他总是要打，但是连一个兵也不敢派上岸。他喊要打便于向美国要钱。我也打不成，因为那里有水，我们的军队是在陆地上作战的，不是在水上作战的。除此以外，台湾有美国另加蒋介石。我们还是要说和，美国怕我们“冒险”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

我驻波大使。他们两人已谈了两年多了。两国大使乘同一架飞机去日内瓦，又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地点。大约要谈一百年吧！

二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完全不能得到人民的同情。蒋介石要打我们，但全国人民却不要战争。我曾去过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会谈，周恩来也跟他们进行谈判，后来在南京又谈。先后谈了一年，并且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协定。这些都是从达到战略目的的策略观点出发的。策略是：由于人民要求和平，不喜欢蒋介石，但对他还有幻想，而对共产党还不了解，我们必须提出和平口号，让人民清楚地看到谁要和平，谁撕毁和平协定，谁对把全国人民投入战争负责。于是人民便觉悟起来，一致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的军队也不想打仗，不然我们的武器从哪里来呢？

在我们的宣言中，提到和平过渡还是战争过渡的问题。宣言里有一长段讲争取和平过渡，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广大人民不想打仗，要和平。假如我们共产党人天天讲要打，要用暴力推翻政府，那么我们便会脱离群众，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和平。这样做的目的是逐步地使群众觉悟起来，这是一只手。一个人总是有两只手的，还有一只手，那就是后面写的一段，假如资产阶级要使用暴力，那么无产阶级便被迫使用暴力。这个口号是作为防御口号提出，你先打我，我才打你。如果资产阶级不使用暴力而让出政权，那是谢天谢地。但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当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我们还有一只手。我们事先有准备，你先打我，我便打你。那么谁

还能说共产党人是好战分子，不人道呢？同时，由于我们有准备，在精神上使自己决不解除武装。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不相信资产阶级会自愿地退出政治舞台的，当我们要它命的时候，它便不干了！什么叫要它的命呢？那就是取消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便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

三

我们很多同志仇视蒋介石，相信还是做国民党普通党员的工作好。这个问题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我们才懂得，你不把蒋介石搞好，怎样能把国民党普通党员搞好呢？因为普通党员还是听蒋介石的话的。于是我们和蒋介石达成抗日协定，并且还声明在蒋介石领导下抗日。我们说，我们赞成三民主义，声明三民主义是现阶段革命所必需，共产党人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我们声明共产党人并不放弃我们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但是现阶段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情，于是他们也就不怕了。我们的军队由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换军服，换帽子，主要是换帽徽，由五角红星的帽徽改成青天白日的帽徽。同志们死也不戴，甚至痛哭流涕。我们向他们说：没有对反革命的仇视，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你们不想换帽徽便是保卫革命，这是很好的，我们要向你们致敬，但是帽子还一定得换。我们说服战士们放弃工农红军的军帽，以便于与国民党一道打日本。拥护蒋委员长^[1]抗日，实现三民主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换军帽这一套，是策略，是为达到战略

[1] 蒋委员长，指蒋介石。

目的的策略。这样我们便壮大起来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使我们的军队由三十万人减到两万人，我们运用以上所讲的策略再由两万人发展到九十万人，这就为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便取消青天白日帽徽，把八路军、新四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到现在还是叫人民解放军。这一套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你们那里既没有工农红军，也没有换军帽的问题，但是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比如，画一个圆圈，它并不是直线而是弧形的，但是把圆圈切开来，每一份都是直的。两点之间只有一条最直的线，这是几何学上的原理。这一原理是对平面说的，而不是对球面说的。球面则不同，在球面上可以有许多线都是直的。地球上的经线不是都相等吗？我们必须懂得平面，同时也必须懂得球面，要懂得平面与球面的统一。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 实习生的讲话

(1957年11月17日)

同志们：

我向你们问好。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们都老得这样了。但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老的有经验，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好，今年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说的。二个阵营，其中有中间地带，西方世界有四亿人，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人，我们可以挖它的墙脚，那里会发生地震的。我们有十亿人，我们中间也有他们的人，譬如中国的右派。这种人比较少，在中国约占百分之二左右。二方面都有对方的人。就好比宋末元初赵孟頫妻子的一首诗里说的：“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这个比喻虽然不完全恰当，但有点是对的，即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也有他们的人。但他们的阵营中我们的人多，在我们的阵营中他们的

人少。

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我们约有十亿人，帝国主义约有四亿人，还有几亿呢？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子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上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中七亿多已取得了民族独立，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黄金海岸等。还有六亿人在那边，如日本、伊朗、台湾、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那一套。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德、意、日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美英不合作，这中间地带的十三亿人由二个阵营争夺，他们大多是倾向我们的。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也没有在那里搞军事基地。

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小国。在政治、人口上是大国，但在经济上是小国，还比不上比利时呢！你们大概不高兴吧！但又有什么可以不高兴的呢！比得上就是比得上，比不上就是比不上！

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一百年来这次大会是最盛大的一次，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几天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这两天在开六十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能结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的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转折点，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二个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一起开会，这也是大转折点。这是二个世界的战争，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不对，

应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就这么一提，好比人民政府在这头，工农群众在那头，资本家在中间，二边一夹就夹过来了。

有些外国人说：“我们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我这个脑子也是洗出来的。参加革命后，慢慢洗，洗了几十年。我从前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封建教育。孔夫子的书读了不少。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只知道华盛顿、拿破仑。你们就好了，你们很幸福，像你们这么大的娃娃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多列士、杜克洛、陶里亚蒂等。我们那时对于中国革命是怎么搞法，有谁知道？！”

我们大家都要割尾巴，我也劝你们割尾巴。中国有句古话“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很有道理。现在人都进化了，摸起来就没有尾巴了，但无形的还有。右派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青年人应该具备二点，一是朝气勃勃，二是谦虚谨慎。

今年国内五月到六月是满天乌云，我们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让右派骂。他们骂共产党是王八蛋，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少错误多。我们把它都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们还给机关学校下了指示：硬着头皮，别开口。国内贴了许多大字报，你们这里没有贴吧？北京大学贴了几万张，《人民日报》是小字报。好，鸣放就是鸣放、就到人民面前去报账，让人民去讨论。右派是打垮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你们没有做过工作，不知道。你们去当当厂长、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教授、工程师试试看。一做工作，就会有错误。八年来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是件很大的事，我们要认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干部放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农民都

说：“老八路又来了。”基层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一有严重缺点，脱离群众，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其中一部分有错误，但可以改正。

我国人口现在六亿四千万，已经不是六亿了。要六亿四千万人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世界。要做到这一点，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老的四十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部分有主观主义成分，在新的纲要中化学肥料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吨。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召集不少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话，问他们能否做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又如除四害的问题，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人建议麻雀不要打，就网开一面，城里的不打。这里有没有四川人？四川的老鼠是多得很。北京的苍蝇打完了，过了两年又有了。这个问题也要有决心，大家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这类事情上也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后，钢的产量就有二千二百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们问过波利特同志，他说十五年后英国约能生产三千万吨，那么，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超过英国，苏联就会超过美国。那时世界面貌就会大大改变。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要十五年或者多一些，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活五年，如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要是孔子现在还不死，二千多年前的人现在还不死，那还成什么世界。所以，我开始就和你们说了，世界是

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句，祝贺你们，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第一，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第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

第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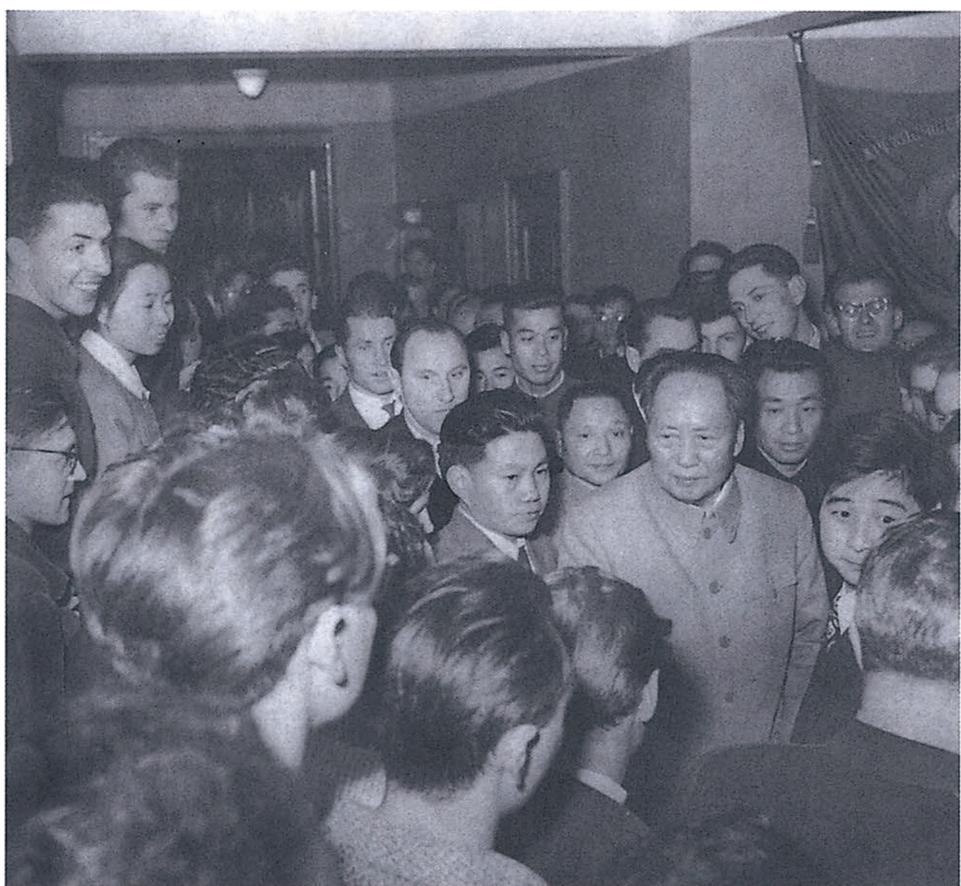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并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的著名的讲话。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讲话。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



1957年11月，毛泽东和李银桥（右）、张仙朋在莫斯科。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画)

为感谢苏联人民的情谊 给《真理报》的信

(1957年11月20日)

《真理报》编辑部：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你们伟大国家的逗留期间，收到了苏联公民们的大批信件和电报，其中有的还附来了珍贵的礼品。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都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它的成员以及对我个人的最诚挚的兄弟情谊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们把苏联人民的这种感情看作是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象征。因为我和我的同志们难以对这么多的信件和电报一一作复，请让我们通过贵报转达六亿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们和我个人对苏联人民、对所有给我们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的苏联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于莫斯科

给苏联领导人的感谢电

(1957年11月21日)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1]:

当我们将要离开伟大苏联的国土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再一次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邀请我们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和访问你们的伟大的国家，感谢你们对我们非常亲切的接待，感谢你们对我们和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深厚的兄弟情谊。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同志们身体健康，祝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永远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伊尔库次克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伏罗希洛夫，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祝贺诺沃提尼当选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1957年11月21日)

亲爱的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

欣悉你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谨以中国人民和我个人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你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授予你最高国家职位，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对你无限的信任和爱戴。

祝你在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 扩大会上的讲话^[1]的批语

(1957年11月24日)

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2]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作了修改，于11月20日再送毛泽东审阅。这篇讲话后来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题目改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2] 指胡乔木。

给张明霞^[1]的信

(1957年11月25日)

张明霞同志：

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

《蝶恋花》^[2]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3]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1] 张明霞，当时在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读书。

[2] 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这首词是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原题为《蝶恋花·游仙》。在给张明霞的这封信中，毛泽东改《游仙》为《赠李淑一》。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这首词的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3] 指《鹰之歌》。这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张明霞等9位同学组织的“十月诗社”办的一个油印诗刊。他们从长沙市第十中学李淑一处抄录毛泽东写的《蝶恋花》词以后，于1957年6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允许在《鹰之歌》上发表。毛泽东回信时《鹰之歌》已停刊，这首词于1958年1月1日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 独立和解放纪念日的电报

(1957年11月26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霍查同志：

当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四十五周年和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四十五年前，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反对土耳其的黑暗统治、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大大地鼓舞了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信心。后来，在反法西斯的解放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出的英勇、刚毅、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精神，受到了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十三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间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于这些成就感到极大的欢欣鼓舞。

近年来，中阿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以彭真^[1]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以里塔·马尔科^[2]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的相互访问，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友好合作关系。

祝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幸福生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阿两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和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1]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1957年1月曾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2] 里塔·马尔科，当时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1957年5月曾率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

(1957年11月27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国务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同志：

当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的南斯拉夫人致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的友谊几年来获得了不断的发展。今年，以彭真^[2]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南斯拉夫的访问，以及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同志和以斯坦鲍利奇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国务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的电报。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

[2]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国民议会代表团的先后在我国进行的友好访问，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南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友好合作。

祝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慰问电

(1957年12月4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获悉阁下于十一月三十日突遭歹徒袭击。谨向阁下致亲切的慰问，并且对这次事件中不幸牺牲的人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为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失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

(1957年12月)

—

送胡乔木^[1]同志：

(一) 此文^[2]好，转载并广播；(二) 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3]，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此点请你和邓、周^[4]一商，指人起草，两星期内务必发出；(三) 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5]。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7年12月4日《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195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于1958年2月12日发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刊载。

[4]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

[5]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同时，发表了《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

二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1]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2]，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五日八时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

[2] 指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这些讲话于1958年5月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印发给到会代表。

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三

乔木同志：

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1]。请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七日

[1] 指1957年12月27日《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9张有关的照片。同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报道、特写、社论和其中的一张照片，报道的题目改为《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无蝇镇——吴兴南浔》。



1957年12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12月2日，毛泽东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1957年12月，毛泽东在第八次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期间接见武汉“二七”老人林茂祖。



1957年12月，毛泽东等接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右四为赖若愚。



1957年12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接见马恒昌等新当选的执行委员。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

祝贺非洲人国民大会 第四十五次年会召开的电报

(1957年12月12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阿·尔·达姆波先生转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

值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四十五次年会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祝你们在团结南非各族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中不断获得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1]

(1957年12月1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很年轻，这对你们的国家很有利。

吴巴瑞（以下简称巴）：因为我们的国家很年轻，所以领导人也很年轻。

毛：我国也很年轻，不过我们由于长期参加游击战争，所以年龄比较大一些。缅甸的面积不小，每人平均有多少土地？

吴觉迎（以下简称觉）：每人平均一英亩耕地。可开垦的荒地还有很多，目前的耕地面积是二千万英亩，大概还可增加四千万英亩。

毛：中国每人平均只有三亩，缅甸每人的平均数比中国多一倍。我们的可耕地很少，但你们不用害怕中国是否想要缅甸的土地。缅甸的土地是缅甸人民的，中国任何人都不能要缅甸的土地。

前次吴努总理来华时，我问他缅甸是否有人害怕中国，他说有些人害怕。当时我也向他解释过，缅甸不必害怕中国，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对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一样反对。

觉：我们也相信中国是这样的。不过在吴努总理来中国之前，和同毛主席见面之前，缅甸对中国确实有些害怕，因为缅甸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自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并在我们共同倡导五项原则后，我们彼此都了解了，所以现在缅甸没有害怕的情绪。

[1] 这是毛泽东和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等谈话的一部分。

毛：过去缅甸认为云南省是黑暗的，不知中国在那里放了多少军队，对缅甸在搞些什么鬼。那时缅甸对我们很不放心，因此我们就建议缅甸在云南设立领事馆看守着。

巴：我们产生这种害怕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国总是欺侮小国。缅甸是处在大国之间。不过现在我们这种害怕已消失。

毛：尼赫鲁总理也对我们讲过，说有些国家害怕中国，有些国家害怕美国，甚至还有些国家害怕印度。我们同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是友好的邻国，所以我们对我国的西南部很放心。对北部也很放心，因为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当然我们不害怕日本、菲律宾、台湾和香港，而是害怕美国，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搞我们的鬼。我们的海岸线很长，达一万二千公里，所以我们要更注意海防。在我们西南部，我们不必放很多军队。

巴：缅甸决不会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决不会成为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基地。

毛：中国国家大，事情多，连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怎么还会想到去侵略别人呢？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满足人民的吃、穿。有些西方观察家，如艾德礼认为中国人多，将来出路成为问题。他们不知道中国平均养活一个人只要十五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一亩），有些地方只要三十分之一公顷（半亩）就够了。我们人口在增加着，估计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十亿。可是到那时我们的工农业都发展了。

周恩来总理：那时十个人可有一公顷土地，即每人一点五亩。

毛：因此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假使人类能发明人造粮

食就好了，目前穿衣可用人造纤维解决。

觉：如果人造纤维能大量生产，现在种棉花、种麻的土地就可用来种粮食了。

毛：国民党残余部队在缅甸还有多少？

巴：还有一些。但是他们都流窜在缅甸、老挝边境和缅甸、泰国边境，行踪很难捉摸。我们派军队去追击时，他们就逃到老挝或泰国去。等我们军队一走，他们又回来进行骚扰。

毛：数目少了一些了吧？

巴：估计还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人，不过已不成为政治性的组织，而成为股匪，到处抢劫。过去最多时有一万二千至一万六千人。

毛：这些中国人很对不起缅甸人，他们破坏缅甸的村庄。不知缅甸是否向中国要求赔偿？

觉：这些坏人同中国政府是没有关系的。

毛：不过我们还是这样感觉的。你们帮助我们去消灭他们，这是互相合作，因为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巴：在这个问题上，泰国给了我们一些帮助，中国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例如，我们过去派空军去轰炸这些国民党部队，有时飞机越入泰国国境，这样我们只能经常向泰国道歉。现在达成谅解了，因此也就好了。

毛：假使泰国能变成像你们的国家那样就好了。泰国是参加东南亚条约的国家，不过泰国的大多数人对我们是没有敌意的。泰国有些人怕我们去侵略他们，因此有人就造谣说，中国要给在中国避难的前泰国总理乃比里十万大军打回泰国去；又造谣说，中国在搞自由泰国活动。当然后来泰国对我们有了了解。

觉：泰国在一开始时对中国是有这种害怕的。

毛：他们派了一些代表团来中国看过，现在好一些。缅甸同泰国有外交关系吗？

巴：很早就有，不过改进两国的邦交关系还只是近几年来的事。

毛：上次我曾对吴努总理讲过，希望缅甸帮助中国做一些泰国的工作。

吴拉茂：吴努总理已作了努力。巴基斯坦是东南亚条约国家，但它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泰国也可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毛：你这种观察很对。

巴：吴努总理不久将去泰国。

毛：请转告吴努总理，希望他再帮我们一点忙。他已帮助过我们，我们很感谢。相信在一段时间后，我们同泰国的关系一定会搞得更好一些，目前泰国还不敢这样做。



1957年8月2日，毛泽东等在青岛市政协礼堂接见缅甸联邦国会访华团。

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1] 给叶子龙^[2]的信

(1957年12月17日)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3]、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二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1] 指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1957年12月9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共9个部分：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二、农村工作；三、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四、财贸工作；五、知识分子工作和文教工作；六、资

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七、肃反问题；八、军事工作；九、党的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是有起伏的。在这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被迫退却，斗争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缓和下来。”“这种斗争的起伏形势，将在若干年内反复地发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通过这种起伏，逐步地减弱以至消灭。”报告批评了当时党内看不到敌我矛盾仍然存在的右的倾向和夸大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左”的倾向。这篇报告发表于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指出：“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报告针对党内的思想分歧，批判了忽视敌我矛盾和夸大敌我矛盾的两种错误倾向，坚持了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里所批判的错误观点，目前在其他地方的党组织内也是存在着的，也是必须加以澄清的。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些理论性原则性的问题展开大辩论，对于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贯彻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有很大的意义。”在江华作上述报告半个月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审阅了这一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

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这一段话后面加写了“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一句。

[2] 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给周世钊^[1]的信

(1957年12月17日)

惇元同志：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给李淑一^[1]的信

(1957年12月17日)

淑一同志：

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五百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

顺祝教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1] 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杨开慧的好友，当时在长沙市第十中学任教。

给孙燕^[1]的信

(1957年12月17日)

配君同志：

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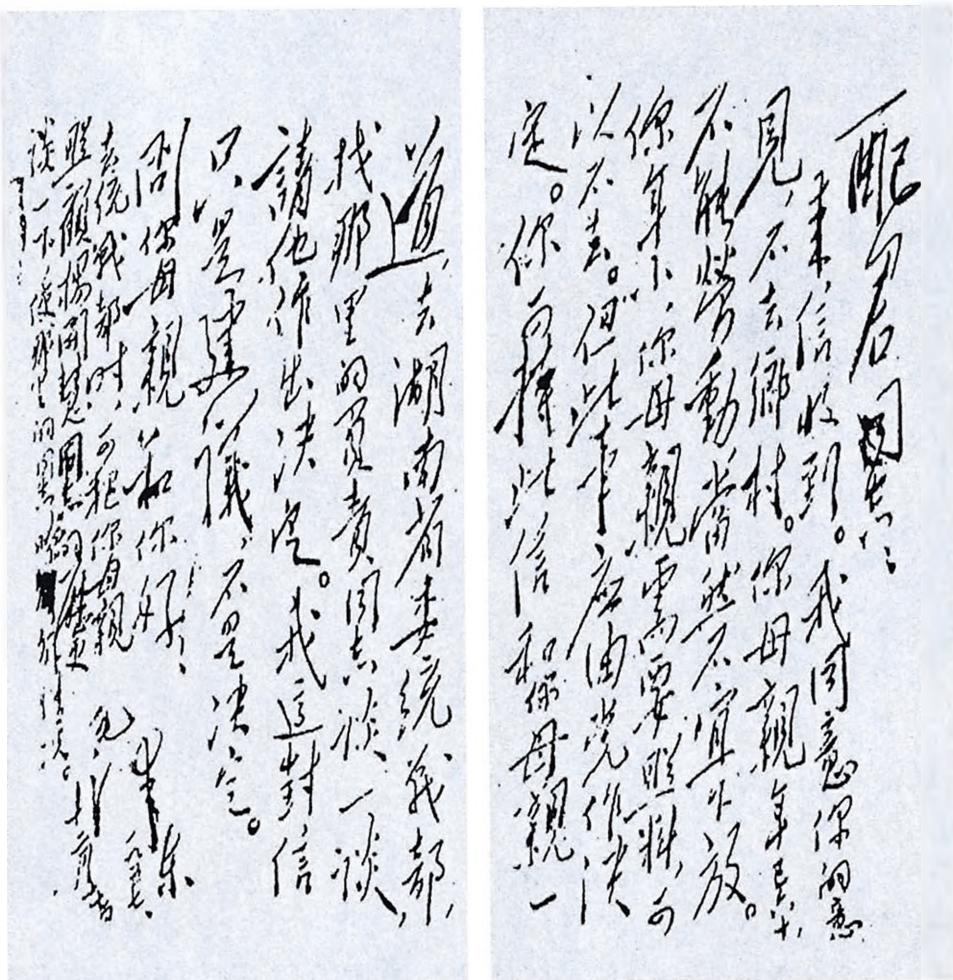
问你母亲和你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1] 孙燕，学名孙佩君。她的母亲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毛泽东致孙燕信的手稿。

空军要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1]

(1957年12月18日)

退彭德怀^[2]同志：

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1957年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说，台湾飞机今年多次偷入大陆沿海重要城市和内地，空投了大批反动传单和“慰问品”，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由于部队有些领导同志对防空作战思想上不重视和领导上检查督促不严，对窜入内地蒋机均未能将其击落。为了迅速扭转这种状况，我们已布置空军和各军区今后必须采取一切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可能入侵内地的蒋机给以应有打击，并力求将其击落。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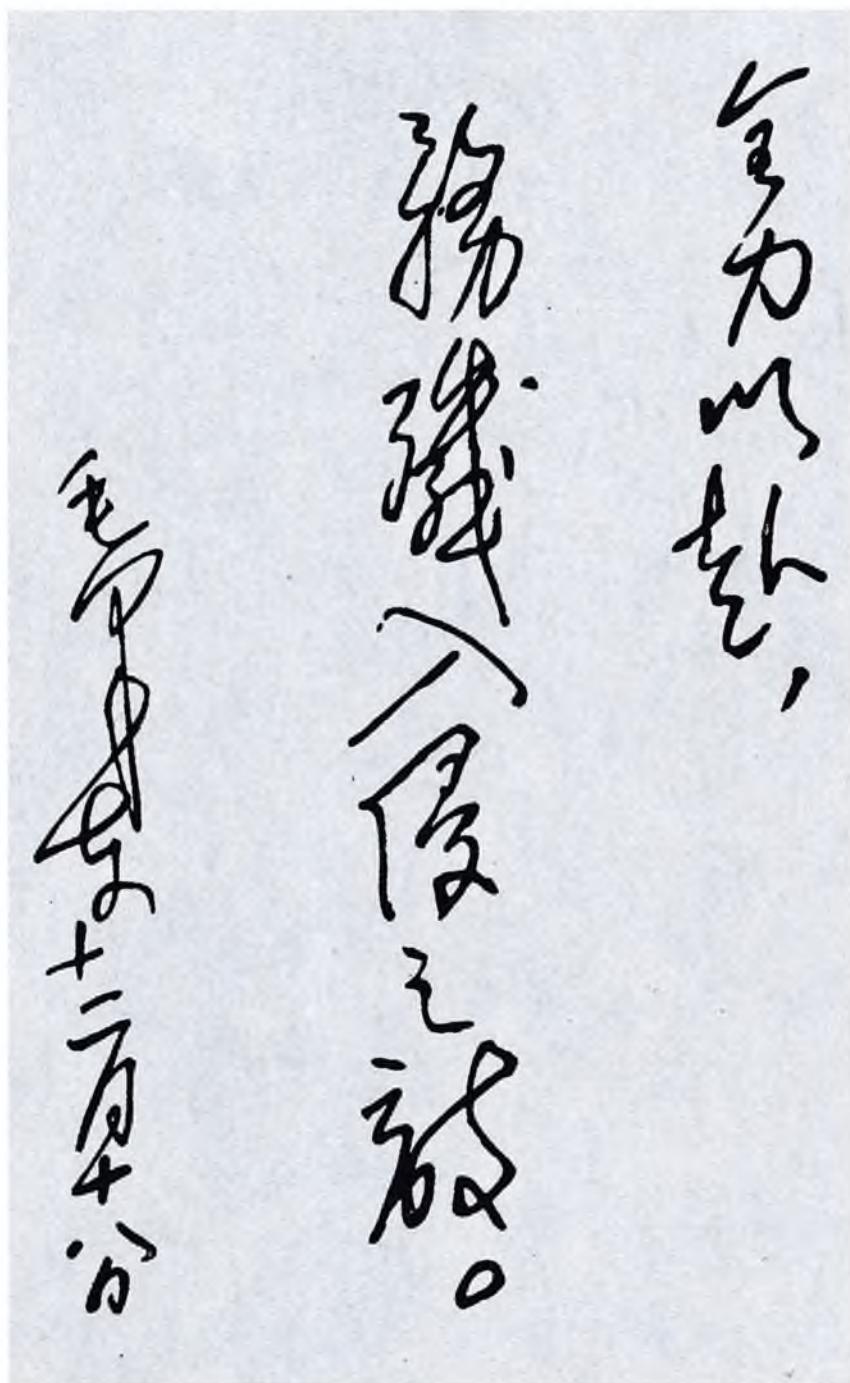
为空军题词

(1957年12月18日)

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为空军的题词。

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的电报

(1957年12月26日)

亚非团结大会：

亚非团结大会的召开，对于发扬“万隆精神”，促进亚非人民团结，争取和维护亚非民族独立以及对保卫亚洲、非洲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将有巨大的贡献。谨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957年12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杭州。

对从朝鲜撤回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1]的批语

(1957年12月31日)

同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1] 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是周恩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议后拟出的。关于撤回志愿军的办法，方案提出：全部志愿军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分为3批，每批各撤1/3。第一批在1958年3月至4月撤回；第二批在7月至9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撤回。

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

(1957年)

记者问：生活在比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毛：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1958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

对《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 新闻稿的批语

(1958年1月2日)

乔木^[1]:

红领巾新闻^[2]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3]。

毛泽东

一月二日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7年12月30日《新民报》晚刊登载的新闻《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报道了南京市雨花台区第一中心小学少先队向江苏省少先队员提出开展“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活动的倡议。主要内容是：（一）开展各种义务劳动，像积肥、修水沟、除四害、扫盲、种向日葵等，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贡献力量；（二）用我们集体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钱集中上缴，在最有意义或最需要的地方修建红领巾水闸和水库，作为少先队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献礼。报道说，他们的倡议已受到江苏省教育厅和共青团江苏省委的支持，红领巾水闸和水库的修建地点也已确定，“红领巾水闸”将修建在涟水县，“红领巾水库”将修建在赣榆县。

[3] 这条新闻经过改写，以新华社南京10日电播发，载于195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上，题为《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

祝贺缅甸独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8年1月2日)

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阁下：

在贵国独立十周年的時候，我謹代表中國人民，並且以我個人的名義向閣下和緬甸人民表示熱烈的祝賀。祝緬甸聯邦繁榮和緬甸人民幸福。祝中緬兩國人民間親密的友誼永世長存。祝閣下身體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

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1958年1月3日)

—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兹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1]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

[1] 《上海市关于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中说，1957年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人委召开了行政会议和各区电话会议，布置了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突击。12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市工商联、团市委、市妇委、卫生局等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干部千余人组成了100个突击队，深入到17个区38个单位进行了半天的除四害突击活动，在全市人民中作出了榜样。现在全市比较显著的蚊蝇孳生地初步进行了清除垃圾、堵竹节、挖蛹工作。各个区的卫生运动都开展得有特点、有目标。如东昌区的突击点是发动户籍警深入到每家每户宣传除四害，各办事处均有一个重点户带头示范，树立旗帜，并已决定将每星期四作为除四害日。

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中共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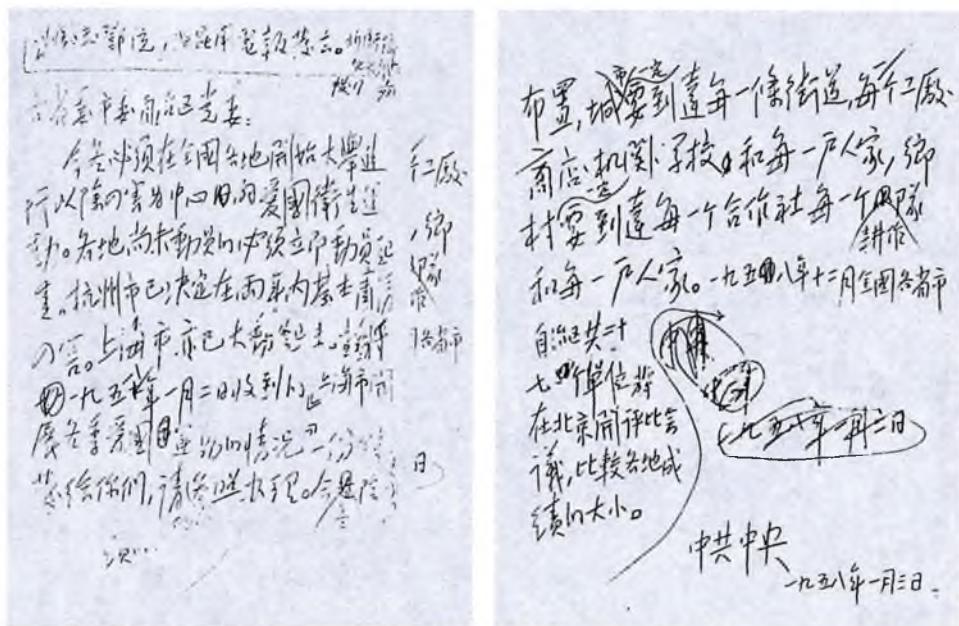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二

刘、周、朱、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抄卫生部和各部门。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的手稿。

对《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1]的批语

(1958年1月3日)

乔木^[2]:

[1] 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发表了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社论说，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热烈讨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认为纲要所规定的粮食生产指标和其他各种主要指标，在浙江不仅可以实现，而且可以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稍多一点的时间内提早实现。社论指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它能不能提早实现，是否有勇气促进农业生产在现在的基础上来一个大跃进，在人们思想上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对立思想的斗争。有勇气、敢作敢为的人是我们事业的“促进派”；没有勇气、怀着无穷忧虑的人是“促退派”。社论列举了这两种人在对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自然条件、依靠谁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推广先进的增产经验等方面所取的不同看法、不同结论和不同态度，指出：促进派比较能够全面地看问题，既看到困难的一面，也看到有利的一面，因而能够充分发挥积极因素，克服困难；促退派则往往只看到困难，夸大困难，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消极畏难。社论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应当是促进派，而不应当是促退派。毛泽东阅读这篇社论时，除写了这个批语外，还把社论中“在我们的队伍中，毕竟有少数人是促退派”一句中的“少数”二字改为“许多”；把“好像农业生产注定了不会大跃进，只能以爬行的发展”一句中的“爬行的”改为“爬行方式”。1958年1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对《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的批语

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

毛泽东

一月三日

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 一文的批语

(1958年1月3日)

江青阅，此件^[1]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1] 指1958年1月1日《光明日报》刊载的王佩琨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文章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并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水泥、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在杭州会议^[1]上谈两类矛盾问题的 讲话提纲

(1958年1月)

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间〈期〉）

大量：先进、落后

原因：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主观主义的原因；领导的原因——领导好，形势先进占多数，落后迅速克服。

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1] 指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另据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转载《浙江日报》报道，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视察了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向该所所长楼光宇询问了所里的研究工作情况，并问：“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楼光宇答：“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毛泽东接着说：“要做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楼光宇回答说：“好的。”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1月3日）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匹，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治淮的数量，如果打七折（有些有质量上的问题），也是合算的。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甘肃一千多万人，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

要抓十二条，今后要评比：1. 水；2. 肥；3. 土；4. 种（优

良品种）；5. 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6. 除病虫害（浙江因虫损失一亿斤，一年夏把虫灭得差不多了，日本无马克思主义，已搞得无虫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7. 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等）；8. 畜牧；9. 副业；10. 绿化；11. 除四害；12. 治疾病讲卫生。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条，也要评比：1. 工业；2. 手工业；3. 农业；4. 副业；5. 林业；6. 渔业；7. 牧业；8. 交通运输业；9. 商业；10. 科学；11. 文教；12. 卫生。

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如果大家同意再商量着办。大家都要到别的省参观参观，自己不出门，比输了就活该。很值得到甘肃去一次。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开几次会，开小型的会，抓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不超过五天，县委到地委去开会（几个地委一起开，比较有兴趣）。大型的“非常会议”，一年只能开一两次，要两个月抓一抓，否则一年很快过去了。各省评比，在中央开会。

我自己每月同大家谈四次，到处跑一跑，每次两天到三天，看五六个单位。

工业也要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先有个别人准备意见，大家再七凑八凑才成。

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要认庙不认神。要有这么一个传统，有庙不论谁在那里挂帅，就由他做头，能

凑合过去就行了。沙文汉、杨思一等是另外一回事。

湖北省委有个关于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转了，看到没有，很重要，要普遍搞试验。

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究竟积累问题多大，有的提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百分之五十五。最好一半一半，要看年成，看地方，作几种规定。百分之六十分掉不是一般标准，是减产的情况。要勤俭持家，个人的消费要节约，红白喜事，大吃大喝要反对。各省要出个布告禁赌。婚丧喜庆，红白喜事，都要从简，家庭造酒，完全禁止也不好，爆竹不要禁了，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做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地县社都要搞，先搞粗线条的省，要半年交卷。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1月4日）

《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口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口口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它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暂时的，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开会的都有散会的思想，越开得长，越想散会。

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级数学。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圆周割裂千万片它就方了。圆与方是对立的统一。

思维形式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形式逻辑有不少错误的大前提，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按形式逻辑来说并不错。它只管数量，不管内容。内容是各种学部门^[1]的事。

昨天讲了两个十二条。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一、水、肥、土等十二条，要抓住，相互平衡。有水无肥，有肥无水都不行，是相互联系的。农业十年以后（也许要更多的时间）要实行电气化。电气化犁田。畜牧与肥料有关。又是动力，是肉食，是工业原料。除四害与劳动力有关，增加体力，振作精神。

[1] 原文如此，疑似漏字。

二、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二条要抓住。

三、反浪费。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四十五万，占资产之一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资。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人家都不信。只要一个材料就够了。剖一个麻雀就够了。不一定剖太多。

整风中以十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十天到十五天时间就可以）。可以搞几十亿。

四、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要当作大问题来研究。这个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六十等，各种分法要研究。春季即抓，不抓来不及了。这是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一九五四年搞了九百六十亿斤，得罪了几亿农民。今年八百五十亿斤，暂时规定三年。我倾向于百分之五十。歉收、丰收有所不同。跟勤俭持家结合起来，可过日子。婚丧喜庆，一律从简。

五、要搞试验田。湖北省委关于试验田（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插话：浙江省委的报告，因为有了《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家就注意去看了。）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六、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作两方面的批判。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政治与业务就是红与专。搞政治的都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湖北省委试验田很见效，搞的时间并不长。

七、打掉官风。上海提出的。不要做官，统统把官风打掉，与

老百姓平等。

八、按时交计划。

九、除四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月大检查一次。“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这句话很好。

十、绿化。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听说三丈多高的树每天要吸收和散发一吨多水，会不会影响地下水？

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生产（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内）。要有全国平衡，不能无政府主义。

十二、开会办法。要大中小型。（各省）“非常会议”（如党代会）一年一二次；中型几十人到二三百人（如开县委书记会议），小型的如地委书记会议。要下去开会，了解他们，“非常会议”谈政治，业务会议也要谈政治。

十三、省委书记、委员轮流离开办公室，一年四个月，到处跑，可以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到一处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下去一周半月也好。不一定到一个地方就是三四个月。

十四、内部不要请客，不要要人家请吃馆子，不要迎送。不专搞舞会，不请看戏。谁去机场接客人，要处分被接的人，这是打掉官气的一个方面。

十五、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

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没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一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

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年就行。□□年加八年，共□□年，不用□□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真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

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 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3. 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

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研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户养两头，还能改造土壤。浙江桐庐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经常把问题放在心上想一想，和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吹一吹，和自己的秘书平等地吹吹，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找几个党委书记谈一谈，不作为决定，作为酝酿。在一个时期内把几个问题想一想，吹一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不要事先不动脑筋，不想一想就开会。有些东西是慢慢成熟的。

十六、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 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 土地革命，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 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太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 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 还有技术革命。

1至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再有□□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辩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争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争取群众，有思想交锋。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

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得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十七、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比的。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大家把几篇文章看一看，《解放日报》登的上海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关于桐庐厂比出品率的报道和王朴写的短评。一件事反映了全国性的事，大家一定要把人家的好事当作自己的好事。搞社会主义，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要当作自己的事。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限划得那么清。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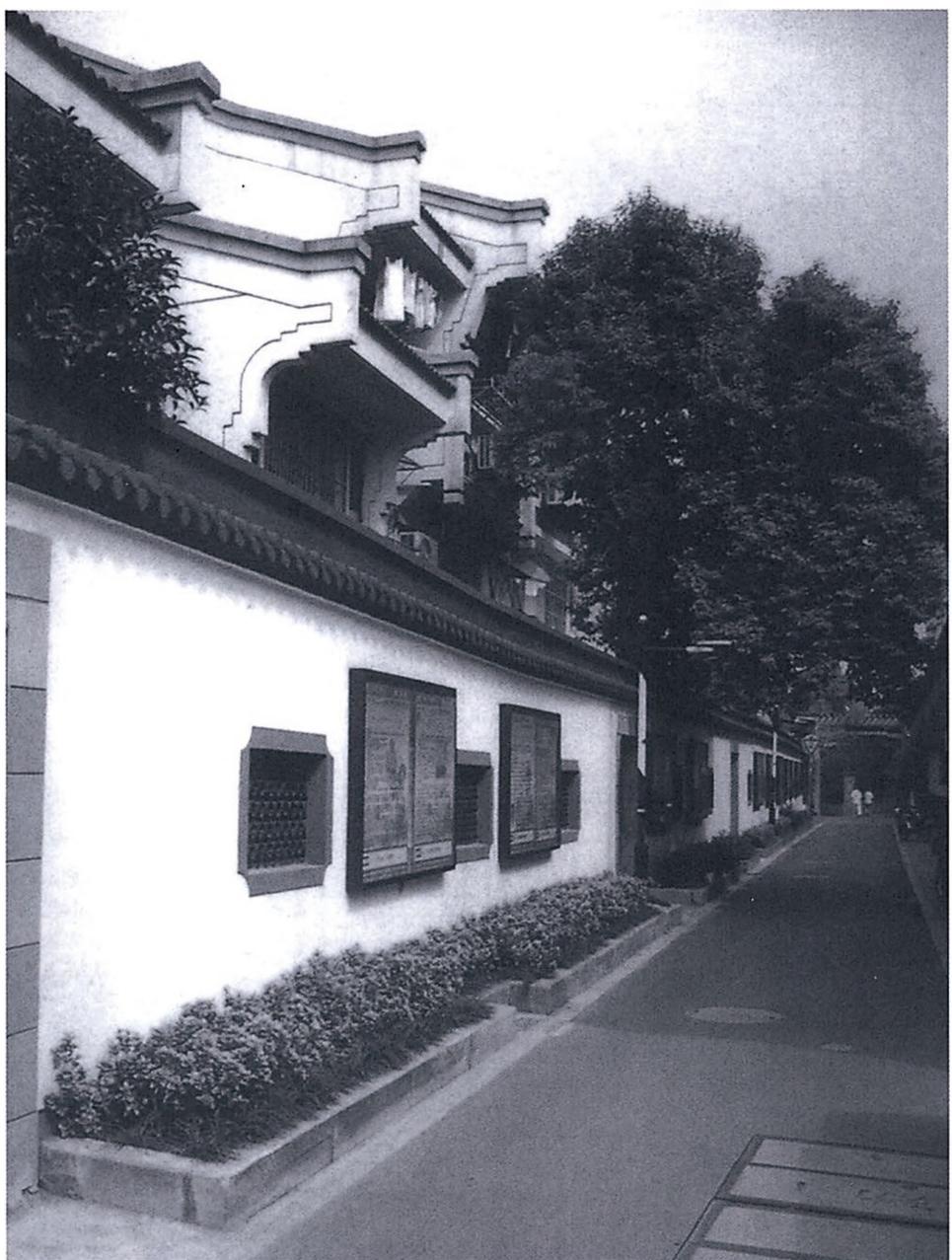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耕田。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耕田。



《伟大的实践》(版画)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浙江时在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的陪同下视察了小营巷。图为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杭州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的陪同下视察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杭州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小营巷居民亲切握手。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小营巷和居民亲切交谈。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参观小营巷61号墙门。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亲切询问小营巷居民的生活情况。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小营巷查看墙上庆祝元旦的黑板报。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杭州小营巷。图为毛泽东在居民家询问居民工作、学习情况。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小营巷居民家阅读当日的《杭州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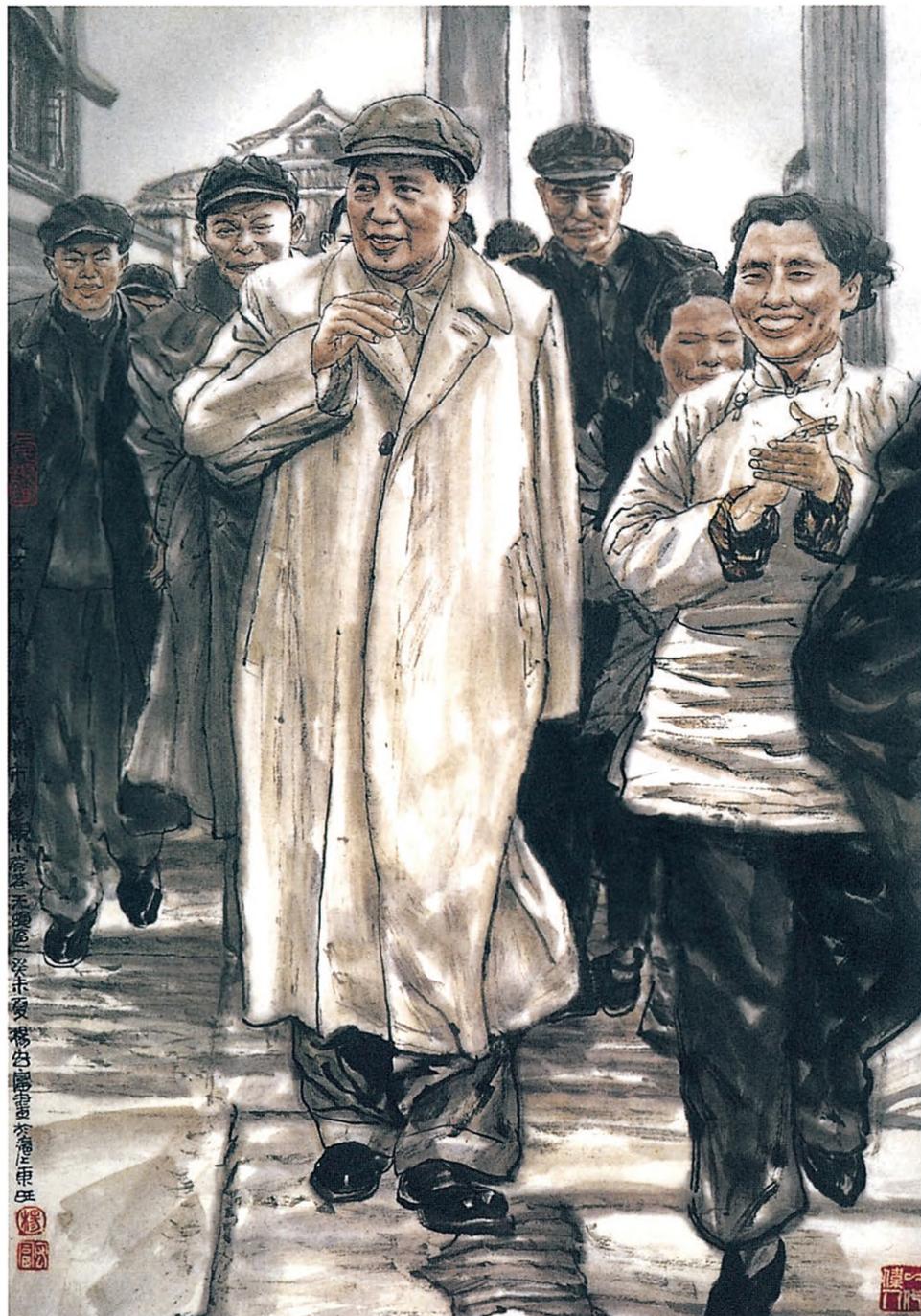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小营巷居民依依惜别。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小营巷的群众告别。



《毛泽东主席视察小营巷》（油画）



《参观小营巷》(中国画)

对《烧砖土可代替水泥》一文的批语

(1958年1月9日)

送乔木：

烧砖粉代水泥这件新闻^[1]，可以转载，并广播。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2]

[1] 指1958年1月8日《广西日报》刊载的《烧砖土可代替水泥》一文，文章介绍了广西省横县南康乡用烧制的砖块轧成粉来代替水泥同石灰、河沙配用，以解决修水利时水泥不足问题的经验。1958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以《烧砖粉可以代替水泥》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

[2] 这里月份有误，应为1月。

关于召开南宁会议^[1]的通知

(1958年1月)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2]，毛泽东，共26〈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廿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

谭震林^[3]管中央，总司令^[4]挂帅。陈毅^[5]管国务院。

[1] 指中共中央准备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至23日举行。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总理，指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处书记。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处书记。

[3]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总司令，指朱德。

[5]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1月)

—

上海报告^[1]

文件，秀才，理论，文风，文法，学哲学，学逻辑，文件的重要性，苏联不重视理论及文件。^[2]

学外国文，十年计划，革命意志，朝气，可以不很〈紧〉张，安排得好^[3]

[1] 指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2] 领导干部要学理论是毛泽东这一天讲话的主要部分，他说：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

[3]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要学外国文的问题时说：外国文也要学，除非发烧三十九度，病得要死。我六十多岁了，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外国文可以休息脑筋。搞个十年计划。工作紧张是对的，但不要十分紧张，要很好安排。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都可。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1]
学楚词，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会议上谈理论
官僚主义

二

外交——兄弟（又团结又斗争）、亚非（又团结又斗争）、西方——使处于被动（另一类型的又团结又斗争）
发展真理，破除迷信
王明
中国的共产主义
天津南京两封信
兄弟国家的怀疑
资本主义初高兴，几天后即清醒，杜勒斯正『正』确，不愧为领导者
办刊物
秀才训练班（山西）^[2]
崔昌益、莫洛托夫、高岗
下一次会议的重点题目是什么？
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

[1] 毛泽东在谈暮气问题时说：暮气，我们都有些，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朝气的对立面。要讲革命朝气。

[2] 中共山西省委1958年1月曾经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指示。

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

落后的劳动者阶级表现积极起来；它的意义是什么？

马克思用这点作标识，证明革命到来了。

1956年我们有些人不认识这一点。

1958年，人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高

如何保持这种积极性？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1月11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试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

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

右派老是喜欢。轻视古典，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典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1月12日）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得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有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

（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法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怪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地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愿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么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做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哪个放得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作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除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画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得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口口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

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湿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

□□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给刘建勋、韦国清^[1]的信

(1958年1月12日)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1] 刘建勋（1913—1983），河北沧县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1913—1989），广西东兰人，当时任中共广西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省长。

刘建勋、韦国清二月廿一
送上来的地方消息，各种野生，又
比较偏僻些，较少吸引人看，内容也不
错，供你们参考。前段时间是毛主席
问题，你们认真研究，同唐西川和胡福
等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文章等
项。毛主席想，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才得如此
比较又比较，半个月时间就研究清楚一
起。精心写好社论《一项神圣任务》，深刻的
毛，宣传部，新华社，中央社，都去研究。
书记接他，部长的报告，是毛写的。一些
名招对扶贫工作，宣传人民，帮助大山里体改
舞，动员大批干部的作用，还你们想一起
上个问题，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廿一
七时

毛泽东致刘建勋、韦国清信的手稿。

祝贺毛雷尔当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电报

(1958年1月12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欣悉你光荣地获得罗马尼亚人民的重大信任，当选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罗两国人民在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结成了亲密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对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并且将继续作出重大的贡献。祝你在为罗马尼亚人民的幸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卓越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不应“反冒进”^[1]

(1958年1月15日)

现在大家对报纸的反映比较好，报纸有进步，新闻、评论都有进步，但还要改进，不要满足。

评论大家写，各版包干是好办法。总编辑是统帅，要组织大家写，少数人写不行。

组织形式，这种“生产关系”有没有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研究。各部门，各版可以竞赛。

写评论要结合情况和政治形势。转变要快。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政论应该像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

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同省委关系要搞好。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

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一样，都应该向地方学习。

《人民日报》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转载地方报纸的好东西，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做。这样，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使他们非看《人民日报》不可。

[1] 本篇是毛泽东对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一部分。

思想评论可以搞。

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

除四害还要搞一个专刊。

一九五六年六月以后宣传反冒进的情况如何，要检查一下。检查那时的评论与消息。

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说什么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当时反右不到半年，这篇社论就以为反右成绩很大，估高了，是不对的。不能说这社论一点马克思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里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者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话，这不对。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际上上是反“左”反“冒进”。

批评双轮双铧犁“冒进”了，说南方不能用，不好。实际是用了，很好，应翻案。为它恢复名誉。

“打破常规”的问题，社论说是“不适当当地打破常规”，这话就不对。革命，就要打破常规。作为方针来讲，不能讲“反冒进”，只能讲“调整”。作为倾向来反，就把多快好省反掉了。

社论说，特别在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四十条”后，产生了“冒进”。这说法是片面的，这样说就认为缺点来自中央。

你们反了右没有？这种说法，形式上是辩证的，实际是把辩证法庸俗化了。反“左”、反右同时并举，四平八稳。

“多快好省”方针本身是全面的，是一个整体，不能说这个适当，那个不适当。

根据经验，工作中有缺点是正常的，不是反常的。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免，要分清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工作中“左”一点，右一点，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方针、方法如何。以后不要提反“冒进”，决不要提。

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 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1月19日)

—

即刻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2]三同志：

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下午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二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⑬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三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四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五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

“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1] 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会1958年1月16日的报告。报告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并写了一个编者按，请毛泽东审阅。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文艺报》编委会报告上的批语；二至五是毛泽东修改《文艺报》特辑编者按时改写或加写的段落。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了“再批判”特辑，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介绍了这一期特辑和所加编者按的主要内容。在这之前，丁玲、陈企霞于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又遭到批判；在这之后，丁玲、陈企霞、艾青、罗烽分别于1958年4月、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肖军虽没有划为右派分子，但点名说他在延安“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1979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罗烽的右派问题分别作了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1979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反党集团”问题和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的结论，并于1979

年9月和1980年1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同意，恢复他们的党籍、政治名誉与原工资级别。198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除重申“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外，还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决定，要求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关于肖军的平反问题，1980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批复，给肖军作了正式的政治结论，确认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并说“1958年1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肖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从而为他恢复了名誉。

[2] 张光年，当时任《文艺报》主编。侯金镜、陈笑雨，当时任《文艺报》副主编。

[3] 王实味，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在整风中受到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于这件事（指处决王实味），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新编本）收入这篇讲话，在注释中指出：“关于他（指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

(1958年1月21日)

—

1.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
2. 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财政（金融）、劳动（人口）（14）
我跟你们今年至少谈四次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至四日华东四省一市
3. 水、肥、土、种、改、虫（病）、机、畜、副、绿、害、病（12）
4. 省与省比 县与县比 社与社与〈比〉
十二月开全国党大会评比，同时开除四害的评比会
5. 分配：积累与消费问题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上作结论的三组提纲手稿。第一组有13页，写在白纸上，标明为1到20。第二组有4页，也写在白纸上，没有分条，其中的头两个问题：“开会的方法：材料与观点的统一”“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正好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记录稿中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第三组有四页，写在横格纸上，标明为23到42条。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增加了一些内容，调整了部分次序结构，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6. 普遍推行试验田
7.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8. 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9. 在整风中每单位以几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
10. 何时交计划？（六月？）省的，地的，县的，社的。
11. 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伟大爱国卫生运动。
12. 夏季为什么不能种树？
13. 省一年开中小型会议四次，几十人的，百多人的，二三百人的，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4. 书记、委员大多数人，轮番离开办公室，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到处跑，走马看花，下马看花。
15. 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计划。
16. 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
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

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气，十分必要。

政治家，一定要懂一些业务，在农业是试验田，在工业试制产品，两者都用比较法，在同一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企业与企业比，车间与车间比，个人与〔个〕人比。

技术方面比，政治方面也要比，看谁领导得更好

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

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17. 文件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古代考据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概念和判断的问题，公式是什么是什么。

例如：皇考是远祖，还是祖父，还是父亲？三后是楚国的三后，还是禹、汤、文，还是颛顼、帝喾、轩辕？兰是现在这样的兰，还是另外一种？

以上是概念问题。

例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以在。〔彼〕尧舜之耿介兮，固〈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猖〉披兮，夫唯截〈捷〉径以准〈窘〉步？

以上，是判断问题。

古代的义理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理的问题

以上二学，都属理性认识。

18. 抓两头，带中间。一个好的方法。

19. 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是一个真理，也是方法。
20. 一年检查四次，每季一次。非常会议一次至两次。一种好的方法。中央、省、地三级，都这样做。今年试一试这个方法。
中央、省、地三级的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时间离开办公室，到处跑，走马，下马。

二

这肯定是一个好方法。

今年实行。

少一天也不可以。

开会的方法：材料与观点的统一。

用材料去说明自己的观点（思想，意见）。将两者割断，互不联系，是一个很坏方法，并且不生动，使人头痛。

有材料，无观点，则更坏。

只需要典型性的材料，解剖一个或二三个麻雀就行。一大堆材料，只会使人短命。自己应〔有〕丰丰〈富〉的材料，但在会议上只需要拿典型。会议所需要使用的材料，和写大著作（例如资本论）所需要使用的材料，有所不同。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

大局与小局的区别

一般与特殊的区别

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裁〈裁〉筋斗。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1]，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教训。

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

响应高饶的教训

登徒子好色赋的方法

我们同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不少。革命吃亏很大。

同少数同志交换意见的方法：

同个别人，同十几人，同二十几人反复交换，多次交换，从而得出比较正确观点、政策。

集体创造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方法。

以一个人为核心

看报纸和研究报纸，看文件和研究文件的方法：

要有区别，研究典型。

学本地话，学普通话，学英文

大学生中右派如何处理，开除 20%，留 80%；根本不开除，30% 劳动考察

城市支援乡村

党大会应有县书参加

参观法，好方法之一

展览法

大字报 快报

[1] 毛泽东讲话中批评 1956 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

三

23. 以平等态度对待干部，使人感觉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觉自己的心是交给了他的。学习鲁迅。

24. 从今年起着重抓工业，抓财贸，一年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工作的负责人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他们有此要求。

25. 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自己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当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一个早晨突如其来拿出成品。要下一些毛毛雨。而不要在几小时内，或几天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量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尽可能减少。要有共同语言，先要有共同的情报知识。

26.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27. 学本地话，学普通话。

28. 中央和省市两级的主要干部建议在自愿原则上会一国外国文，五年至十年，达到中学程度。

29. 学一点文学。

30. 学一点文法和逻辑。

31. 学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32. 学一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33. 学一点历史和法学。

考虑当教授和当教员的问题。

考虑出刊物的问题。

34. 干部和秘书的统一，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和二排议员。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

35. 中央一级、省一级的若干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36. 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中，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举行辩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37. 在三级（或四级？）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的统一——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是否正确？

少奇同志的一条^[1]

38. 是否要事事问过第一书记？

39. 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成过程，思想的形成过程，人脑反映客观世界是不容易的。有了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

40. 如何传达？只是建议，需要发展，在四月党大会以前形成正式条文，准备在以后随时修改。

[1] 指刘少奇在讨论工作方法问题时写的关于规章制度的一条，后来毛泽东将它收入《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三条。

41.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对的。
42. 准备挨骂，硬着头皮顶住。



1958年1月22日，韦国清陪同毛泽东视察广西。



1958年1月22日，韦国清陪同毛泽东视察广西。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冒雨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广西各族人民及广西军区驻邕部队代表。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各族群众。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接受广西少数民族女青年献花。



《红日照南疆——毛主席视察广西》(油画)

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 摘录材料上的批注^[1]

(1958年1月)

针对反右、多快好省提出批评

一、摘自1956年预算报告

(1956年6月15日在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二、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反对保守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的批注。这里把批注和原文对照排印，原文中的横线、波线、竖线和三角等符号是毛泽东批注时画的。毛泽东的批注用宋体字排印。

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收到重大的效果。经过了这场斗争，右倾保守思想已受到深刻的批判，大家都已认识到右倾保守思想的危害。△

.....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庸俗辩证法

?

为什么在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

?
尖锐地
针对我

既然使干部走到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批了右没有？

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

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在你们这个地区、这个部门中，有没有右倾保守，有没有急躁冒进，哪些是右倾保守，哪些是急躁冒进，右倾保守是主要的，还是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右倾保守严重到什么程度，急躁冒进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具体加以分析，不能凭空想象。也可能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地区的工作中，在这件事上是右倾保守，在另外一件事上又是急躁冒进。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给金日成的电报

(1958年1月24日)

金日成首相同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二十五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

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十二月十六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1.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种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 (1) 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 (2) 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 (3) 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2.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3. 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4. 今年二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1]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末，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

[1] 李承晚（1875—1965），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5. 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 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二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 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 一九五八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6. 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1]的两瑞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1]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根据《朝鲜停战协定》于1954年8月1日成立的，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瑞士四国成员组成，执行《朝鲜停战协定》有关条款所规定的监督、观察、视察与调查的职能。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1月24日)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阁下：

值此印度共和国国庆八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伟大的印度人民表示热诚的祝贺。祝中印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不断巩固和发展，并祝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 讲话提纲

(1958年1月28日)

民族发扬蹈厉〈厉〉，大有希望，伟大的觉醒。十五年，五年，三年，头年，头月^[1]。原子核释放热能。

十五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

四千万吨钢，现在是五百廿万吨

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多一点

四千万瓩罗瓦特发电容量，现在是四百多万……

五年到八年完成四十条^[2]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好大喜功，近〈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

又穷又白，又富又文

人多好，少吃一点，东方风味，身体健康

西方人肉食者鄙

工作方法：

[1] 毛泽东讲话中说：15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15年就看今年开始的这五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就看前三年，三年就看头年，头年就看头月。

[2]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40条。

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打掉官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
民主党派也可以这样做

士希贤^[1]

四个月外出，与工农打成一片

北京没有任何东西（原料），但有加工，这是理论^[2]

劲可鼓而不可泄，鼓励士气，还是士气败坏？缺点用鸣放改正。

认真学习：试验田，当工人（每周一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文学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每年检查四年〈次〉，有些十二次

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

右派，开右派大会，一感谢，二帮助，三七开，都有利
共产党准备大改革

民主党派、无党派，怎么样？不可以吗？可以的。

把心交给别人，不可隔一层纸，罗隆基^[3]等人不听
不断革命

[1] 这是毛泽东在说到要打掉官风时引的一句话，他说：过去有句话“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不愿意当圣人当个贤人也好。还有一些好的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历史上有一些统治者是比较好的。

[2]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北京不出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间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加工，我们是个加工工厂。一切思想、计划、命令、法律的来源都是从劳动人民那里来的。我讲的都是一些现成的东西，只有这一条算作理论。

[3] 罗隆基，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林业部部长。1958年2月1日被撤销职务。

帮助同志，去掉疑心

莫斯科宣言^[1]，会议，转折点

1956年反共高潮（批判斯大林），有些人心动，有反响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1]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与16日至19日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1月28日)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作报告的人来没有？（未来）作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

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嘛！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产量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作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千瓦电力（现在是四百万千瓦），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的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轻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

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

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哪五条？有人答……）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典，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典。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嘛，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嘛！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得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

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沙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

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1]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地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12500公里，乘3.1415……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

[1] 应为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

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通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

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

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粘上来了，有时粘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采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反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通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真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

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看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做。做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回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采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它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1]

(1958年1月28日、30日)

一、八年来第一次在一月讨论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这次人大要开得从容一些，多开小组会，大会可以少开，工作缺点看到的要加以批评，准备工作不太好，一方面开，一方面准备，文件可以在讨论后再修改，再发表。

二、我们这个民族，七八年来看来是有希望，特别是去年一年，几亿人口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重新发布等。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也有办法了，如除四害，全民族大有希望，悲观者不对。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文章就在大字。

我们民族还在逐渐觉悟，因为觉了，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进行整风，反右派，中国又穷又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

现在生产与我们地位完全不相称，历史甚久，但钢铁生产比不

[1] 为便利阅读，把前后两次谈话按问题整理在一起，问题排列次序也略有变动。

上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群众热情甚好，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头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作了布置。现在群众热潮好像原子能，发出了热力，十五年后，要搞出四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四千万千瓦电力，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看起来，八年可以完成，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干劲，要鼓足勇气，力争上游。

三、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符合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符合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

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典”，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四、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

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育，一方面节省，要成为风气。

五、工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比较做得好些，一种做得比较差些，也就是两种作风，譬如合作化，一种搞得快些，一种拖到七八年才搞。我看趁热打铁，一气呵成为好。整风中大鸣大放很好，这是右派发明后我们搞的，现在全民中用大鸣大放来整风了。

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除。像除四害一样，官风、官气也是一种迷信。要破除迷信，部长也好，总理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感到在我们面前是平等的，自己感觉平等是靠不住的，要使对方感觉平等。湖北红安县的干部，1956年上半年官气十足，农民很不高兴，下半年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山东干部下放农村，农民说：“八路军又来了。”这几年官气大长，共产党要改，各党派也要改，共产党的负责人，除了病老以外，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向劳动人民取经，回来加工制造，这样可以打掉官气。各党派和民主人士酌情办理，身体不行的可不去。北京不在地方好坏，而在中央机关不产生任何东西，即不生产任何东西，中央只是加工厂，一切原料出自工人、农民那里，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就有了东西。

六、劲可鼓而不可泄，有时没有注意，给群众以挫折。一个时期一些问题上发生了错误，如合作社曾有人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好，举登徒子好色为例，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右派就用这个办法攻击我们的，但好人有时也这样看，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分子也好，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就是右派，多

数也是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好的。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七、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向技术革命，要认真学习，搞试验田，到工厂当学徒，要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劲，六月可告一段落，但并不是说改造好了，将来还要整。

要讲不断革命论，解放后搞土改，土改后搞互助组、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是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接着五七年搞整风，再接着就要搞技术革命，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在这里，要团结每一个可能团结的人。

八、共产党准备大改。整风和反省，各党派也可以搞，现在已在搞，有很大的成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作风也可以改变的。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各党派在进步，整风在继续，但不要勉强。要把事情搞好，把人整好，不是整坏，整风对共产党要求严格，对民主党派不要太严格了。不太严格不是不整，整整也好，试试看。目的是整得适合人民要求，把人整好不是整坏，相信会整得更好，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很值得高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成右派的不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成右派还不到十人，但也给了我们以教训，去年四月三

十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我们说过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要附到工人阶级的皮上来，否则变成梁上君子，但章伯钧、罗隆基等听不进去。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他们很高兴“长期共存”，但他们变成“短期共存”了。

口头喊万岁，切记不要都信，有些人大喊万岁，接受领导，但实际上却猖狂进攻。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真话，要去掉疑心。要将心交给人家，要当面讲，不要在后面讲。“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旧社会的话，现在不适用，逐步做到说真话。

九、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总是要说改造，从未说不要改造，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投降，知识分子在某一点说是最无知识，知识分子不失败一次，不会翻身。我们党失败过多次，从右的和“左”的两大错误中取得了教训，就全面了，民主党派不见得更高明，中共出了高、饶，你们就没有？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要经过严格考验，才能取得教训。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是政治，专是业务，不红只专是白色专家，搞政治的，如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钻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十五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十、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感谢，第二想帮助他们。所谓感谢，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其中使五成到七成的人，经过五年到十年时

间，逐步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不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

右派大会要开，哪一天开，要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

(1958年1月31日)

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要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要吃得饱。学得太多，可以少学一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方面要克服忙乱现象。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年1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1]，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2]

[1] 参见《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2] 杭州会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1月2日至4日在浙江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和南宁会议^[1]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2]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

1. 工业，2. 手工业，3. 农业，4. 农村副业，5. 林业，6. 渔业，7. 畜牧业，8. 交通运输业，9. 商业，10. 财政和金融，11. 劳动、工资和人口，12. 科学，13. 文教，14. 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 产量指标，2. 产品质量，3. 新产品试制，4. 新技术，5. 先进定额，6. 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 劳动组织、劳

[1] 南宁会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

[2] 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三条。

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 成本，9. 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 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 供产销平衡，12. 地质勘探，13. 资源综合利用，14. 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 产量指标，2. 水利，3. 肥料，4. 土壤，5. 种子，6. 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旱、旱改水等），7. 病虫害，8. 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 精耕细作，10. 畜牧，11. 副业，12. 绿化，13. 除四害，14. 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2]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

[1] 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后来没有形成。

[2]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 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 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 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

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

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有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

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

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1]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的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跟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

[1] 鸣放辩论，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1957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广大群众积极对党的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极少数右派分子却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要求实行“大鸣、大放”，他们的不少言论实质上是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进攻。复杂的形势，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规模贴大字报的做法，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上不稳定状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同样运用“四大”的方法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但是这个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演变为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夺权的主要手段。1975年“四大”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修改后的宪法仍将“四大”列为人民的民主权利。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同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当时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

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 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

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

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 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 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

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1]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2]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五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

[1] 立三路线，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2] 陈独秀路线，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 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 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 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 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 学点文学。

(四十三) 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 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 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 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的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

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 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 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 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 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 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 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 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做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 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1]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 * *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回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

[1]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在黃炎培^[1]关于提倡平地深葬的 来信上的批语

(1958年1月)

电话告黃：信^[2]收到了，谢谢他。我赞成他的意见。因忙不写回信了。

[1] 黃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黃炎培1958年1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最近写了一篇《试倡平地深葬》文，认为一般采用土葬法，把很好的可耕地为埋葬死人而浪费，这种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应按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改变。此文曾发表在1月11日《人民日报》和1月12日《新闻日报》，是一种公开建议性质。各报先后转载，人民来信有直接给我的，有送报纸发表的，纷纷表示赞成。我以为此时应广泛地宣传，请新华社宣传一下。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鼓起干劲， 力争上游》的批语^[1]

(1958年2月3日)

退吴冷西^[2]同志。可用。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一时

[1]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稿主要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社论稿说：“1956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的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肯定跃进，肯定好的东西，同时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调整和克服其中个别的缺点。但是有些人却分辨不出九个好指头和一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际反跃进。惩前毖后，我们不应当再用这种错误的态度来对待当前新的跃进。”社论稿还说，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着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形势，“全国大部分地区应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的面貌基本改观”。这篇社论在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

[2] 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通讯社社长。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光辉的道路，灿烂的前程》（油画）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视察重型机器厂》（油画）

对化工部关于第二个五年化肥预计 发展报告^[1]的批语

(1958年2月3日)

退总理：

可以印发。要署部长姓名。另注明“密件，注意保存”字样。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三时

重工业各部，每部都做出一个至几个这样的文件，在几天内交来。

[1] 指化工部1958年2月1日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化肥预计发展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到1962年化肥的预计产量；第一个五年计划化肥厂建设项目建成后生产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新建、扩建和原有的化肥厂生产预计。报告的说明中说：按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曾将1962年化肥的生产水平定为700万吨，最近又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到1962年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到1000万吨的水平。报告还预测了达到1000万吨化肥产量后将取得的经济效果和为完成这一计划所需要的投资、技术力量及原料资源等情况。

对杨勇^[1]关于志愿军撤出 朝鲜报告的批语

(1958年2月3日)

退彭德怀^[2]同志。此件^[3]看过。

毛泽东

二月三日

[1] 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3] 指杨勇1958年1月28日给彭德怀的报告。报告说，鉴于从朝鲜撤走志愿军的形势已定，行动时间迫近，在不放松战备而又节约经费开支的精神下，我们已初步采取了停建营房、仓库，压缩一线永备工事的构筑和动员家属还乡、军官家属一律不准入朝等措施。报告还对各军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和志愿军直属机关的处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给李讷^[1]的信

(1958年2月3日)

李讷：

念你。害病^[2]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厉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3]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

[1]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2] 李讷当时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

[3] 这是唐朝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的一首。其中第四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

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对河北省关于开展除四害 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8年2月4日)

吴冷西^[1]同志：

此件^[2]可发表，广播，用后退叶子龙^[3]。

毛泽东

二月四日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1958年1月31日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简报。简报中说，从目前情况看，我省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已经形成高潮。很多地区全党全民动员向四害展开猛打猛攻，仅10天时间，已取得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组织除四害突击队48963个，消灭老鼠466万多只，麻雀690余万只，清除垃圾1473万余车，挖蝇蛹6414斤，又涌现了大批“四无村”“四无乡”。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经验是：（一）各级党委都结合当前生产、整风进行了统一安排，并亲自动手抓起了这一工作；（二）领导带头行动；（三）采用生动、活泼、振奋人心的形式，对群众进行了有力的政治鼓动工作；（四）充分发挥了党、团员和青少年的骨干带头作用；（五）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群众觉悟提高以及群众有着消灭四害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六）加强了技术指导工作。简报说，为把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省委要求在春节前后再发动几次突击，在突击的基础上做好经常工作，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河北省基本上成为“四无省”。

[3]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传达讨论 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2月7日)

—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上海局，联省会议各召集人，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

发给你们河南省委二月二日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问题的报告^[1]

[1] 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史向生同志参加南宁会议回来后，即于1月29日至2月1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指示，同时向省直各部门负责干部作了传达，2月3日分七个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由常委分头去传达。省委常委会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这是保证把技术革命搞成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获得自己充分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进一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报告说，省委常委会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和我省实际情况，对当前工作作了新的部署，要点是：1. 整风要坚持到底，保证全胜；2. 作好规划，组织全面大跃进，包括提高农业规划指标和调整工业规划，开展文教事业的改革运动，培养技术力量，抓好灾区的基本建设等；3. 开展春节大宣传运动，肯定成绩，推广先进经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

一份，供你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作参考。

中央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

—

刘、朱、周、彭真^[1]即阅发。用电报发各地，印发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除四害讲卫生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2月7日)

—

即退胡乔木^[2]同志。在第六页作了一点修改^[3]，现在许多基层单
位就是这样做的。在第七页上加了灭臭虫跳蚤一句^[4]。

毛泽东

二月七日

—

各基层单位（例如一个生产队，一个工段，一条街道）的除四
害讲卫生工作应该每星期检查一次，各较大单位（例如一个合作

[1] 中共中央、国务院1958年2月12日《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在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4] 即本篇三。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社，一个乡，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区）应该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应该大检查总评比一次，以便为实现长期计划打下基础。

三

向群众提出的具体口号各地可以因地制宜，例如除四害在有血吸虫病的地区要加上消灭钉螺，有黑热病地区要加上消灭白蛉子，有臭虫、跳蚤的地区要加上消灭臭虫、跳蚤，讲卫生在城市中可以包括劝止随地吐痰，在工厂中可以着重防治职业病等等。

对周恩来在全国人大 一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稿^[1]的批语

(1958年2月8日)

退总理。在第三页和第十二页上有一点文字修改^[2]。

毛泽东

二月八日

[1] 指周恩来准备在1958年2月1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稿，题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发表在1958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上。

[2] 在周恩来讲话稿的第3页上，毛泽东将“中国人民也争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稍多一点的时间”改为“更多一点的时间”；在第12页上，周恩来讲话稿说：“亚非各国访华的外宾中，仍然以日本朋友为最多，中国也派出了许多重要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和学习。中国人民深深感谢日本人民和团体对中国各种代表团的招待和协助”，毛泽东删去了这句中的“和学习”“深深”五个字。



1958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接见周谷城。

反浪费反保守是 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1958年2月8日)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的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得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超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

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能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能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

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地讨论一些原则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前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

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关于古代官吏是否禁带眷属问题 给刘少奇的信

(1958年2月10日)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1]，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2]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意。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3]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

[1] 这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一句。原诗全文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信中提到的“少小离家”一诗即指这首诗。

[2] 李白，唐代诗人。

[3] 齐白石，画家，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这时已去世。

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给陈玉英^[1]的信

(1958年2月11日)

玉英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此次看见配君^[2]，她说暂时不做工作，继续补习，将来再讲工作问题。我看这个主意不错，故让她回长沙。她还年轻，目前学习一时期有益。由她带上二百元，不足之数另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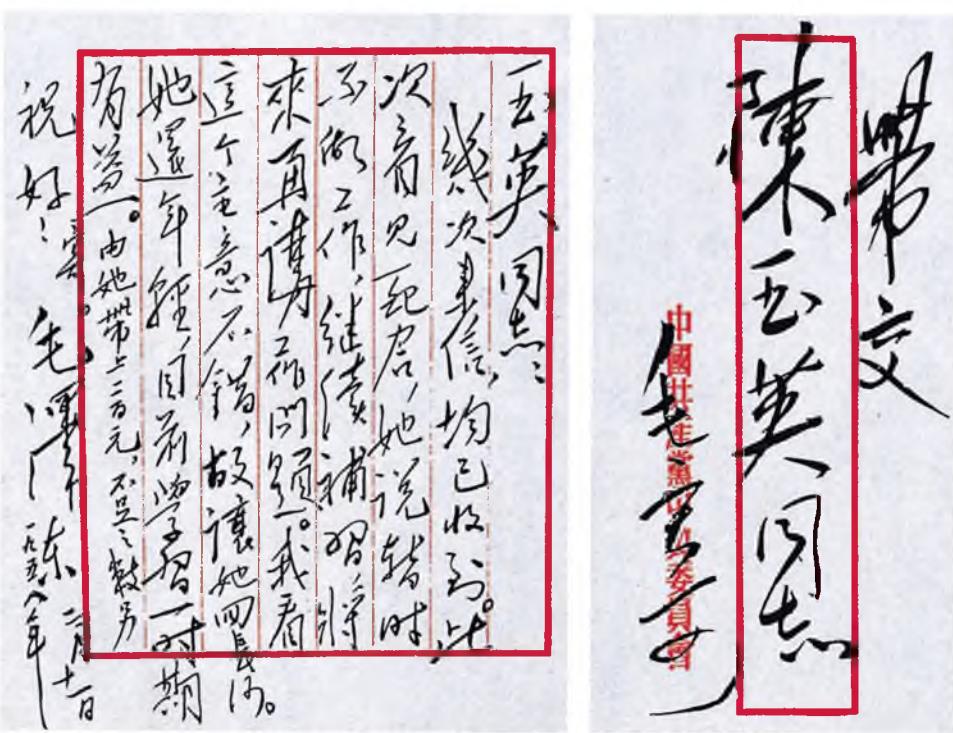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1] 陈玉英，1926年至1931年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2] 配君，即孙配君，陈玉英的女儿。



毛泽东致陈玉英信的手稿。

给杨开智^[1]的信

(1958年2月11日)

子珍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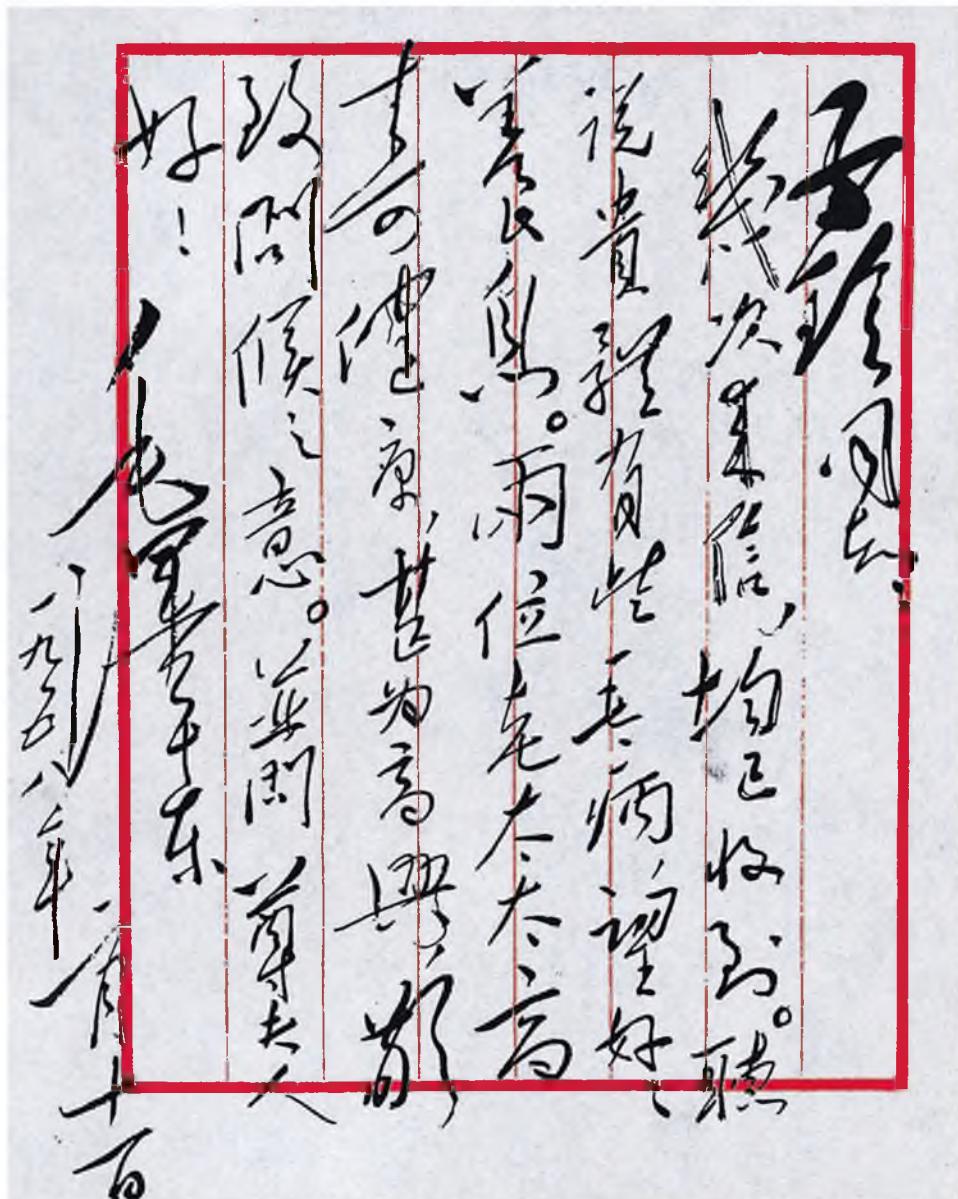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2]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1]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指杨开智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



毛泽东致杨开智信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8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数：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